



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
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马克思

红色中国网文集

(2017 年)

目录

特朗普比波拿巴更加“小丑”，美帝国主义比“第二帝国”更加虚弱.....	2
不是社会主义，就是野蛮 —— 一场关于二十一世纪的对话	8
中国应“弃朝”还是应“灭朝”	22
法西斯又来了？ —— 不是人民怕纳粹，而是纳粹怕人民.....	25
法西斯是从脑子里蹦出来的吗？	36
《现代资本主义研究》不乐观，却很盲目	44
不是朝鲜怕美帝，而是美帝怕朝鲜.....	47
毛主席告诉我们，要不要害怕法西斯？	52
革命是必然的？还是“合法”的？ —— 与夏莹女士聊哲学.....	68
简单说说 1962 年中国为什么在战胜后撤军.....	78
简单分析一下中国房地产价格的构成.....	81
“中帝论”可以休矣 —— 评洞朗事件告一段落.....	86
话实先生的“帝国主义论” —— 兼评小资产阶级左派的失败主义	90
就北大毕业生张云帆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一案致广州番禺警方的公开信	99

特朗普比波拿巴更加“小丑”，美帝国主义比“第二帝国”更加虚弱

2017-1-26

原作者：“红海军”

近来经常听到张跃然同学的大名，但是以往一直没有和他交流过。近日读到网上流传的张跃然的新作，“马克思的《雾月十八》如何帮我们理解当代美国政治”；作者用了很大的篇幅介绍了法国十九世纪中叶的阶级斗争，比较了路易·波拿巴和特朗普上台的某些相似性，最后的结论是：“马克思在《雾月十八》中描述的，从民主共和国到君权复辟的过程，本质上可以看作是资本主义在政治制度层面的一次自我调适，虽然调适的结果，也许超出资产阶级最初的预料。而特朗普的上台，也完全可以看作是资本主义的政治调适、或者资产阶级统治方式的转换而已。”

也就是说，特朗普上台，与当初波拿巴在法国上台一样，本质上并不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危机，更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而只不过是“资本主义在政治制度层面的一次自我调适”，一切都在资产阶级的掌控之下，即使表面上是出乎资产阶级“预料”，乃至至于抛弃了资产阶级的直接“政治代表”，资产阶级的统治不但不动摇，反而更加巩固，“资产阶级和国家权力维持了足够的形式上的距离，实际上却是相互依附的关系；恰恰是形式上的距离，使得二者的相互依附更加紧密、更加安全。”

透过张同学的旁征博引、满纸的马克思主义和阶级话语，唯一留下来的印象，便是无产阶级的无力和资产阶级国家的强大。无产阶级搞武装斗争，可以镇压下去；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参加选举政治，资产阶级照样可以玩弄无产阶级于股掌之中；两者都不起作用了，资产阶级的武器库中仍然可以拿出数不胜数的、眼花缭乱的“政治调适”手段平安渡过。如此说来，社会变革的动力和希望到底在哪里呢？

至于张同学援引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墨菲的观点：“左翼政治力量要想实现自身的政治议程，就必须既以政党的形式参与选举政治，又培育独立而活跃的草根运动基础，两者

缺一不可。在选举政治中夺取政治权力是重要的，但只有草根运动强大，才能尽可能保证左翼政党在夺权之后不‘变质’、真正实现对左翼诉求的代表。”这难道不正是西方的进步社会运动（以及受西方影响的拉丁美洲、南亚等地社会运动）自 1968 年以来几十年的实践吗？几十年了，这个世界是更加光明了，还是更加黑暗了呢？我们有什么理由，有什么灵丹妙药，有什么“神的启示”，可以让我们相信，几十年来越走越窄的“草根+选举”的死路突然就变得道路畅通、前途光明呢？

美国和现代资本主义的危机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马克思的不朽篇章，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永远可以从中汲取营养，获得启发和鼓舞。但是，十九世纪中期的法国的阶级斗争形势毕竟不同于二十一世纪初期的美国的阶级斗争形势；1848-1852 年的世界历史条件也迥然不同于 2008 年以后的世界历史条件。与其削足适履，硬要在波拿巴和特朗普之间寻找一些形似而不神似的相似点，倒不如扎扎实实地分析一下现实的资本主义矛盾及其对阶级斗争的影响。

概括地说，笔者认为，特朗普上台，并非什么美国资本主义政治的“自我调适”，更不会使得资本主义“更加紧密、更加安全”，而是美国和世界资本主义深刻危机的表现，并将反过来加深这一危机。这一危机发展的结果，虽然在短期内并不会造成美国无产阶级革命，但却一定会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创造条件。

在上世纪中期，美国资本主义社会是比较稳固的。但是，不仅美国霸权在世界上如日中天，美国资本家垄断着世界工业；在美国内部，通过“新政”等一系列社会改良，美国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分享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红利”。通过对工人阶级的有限让利，美国资产阶级换取了工人阶级和工会官僚在政治上放弃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目标，形成了阶级妥协的“黄金时代”。

但是，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后半期，这一套“资本-劳工谅解”就已经开始瓦解。由于工人阶级力量上升，工人斗争加强，威胁到了资本家的利润率，并造成了美国和世界资本主义的积累危机。当时，除了日益高涨的工人斗争以外，还有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反

战运动、环境运动等，一度使得美国资产阶级统治发生动摇。为了应对不断加深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美国资产阶级经过尼克松、卡特两个选举周期的调整，以里根上台为标志，向工人阶级发动了全面的反攻倒算，也就是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开始（在此之前，七十年代，智利、中国、英国，已经分别发生了对新自由主义有利的政治变化；美联储已经开始实行对新自由主义至关重要的紧缩货币政策）。

美国资产阶级要打垮工人阶级，克服积累危机，也不是轻而易举的，而是有个过程的。对外，需要有一块新的地理区域，有一支庞大的廉价劳动力队伍，便于跨国资本大规模转移，从而降低成本、提高利润；这个地理区域，是由东亚地区来提供的。对内，美国资产阶级还受到资产阶级民主形式的限制。更根本的原因是，美国作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霸权国家，如果发生重大的政治不稳定，不仅会动摇美国资本主义，更会严重动摇全球资本主义秩序。不到万不得已，资产阶级是不能冒这个风险的。

在整个新自由主义时代，虽然美国工人阶级也付出了不少代价，实际工资长期停滞、下降，但是总的来说，美国工人阶级所受到的冲击远远小于前苏联、东欧、拉丁美洲、非洲、中东地区人民所蒙受的巨大灾难。在世界范围，美国工人阶级实际上还在分享着美帝国主义剥削全世界所获得的超额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也就是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超额利润”）。到了九十年代后半期，一度形成了某种新自由主义条件下的社会妥协：一方面是华尔街金融资本和硅谷高技术资本暴富，同时附庸于这些大资本家的一部分上层中产阶级（即现代“小资产阶级”，如经理、计算机工程师、金融分析师等）也在相当程度上受益。至于美国工人阶级，也通过借债消费、借债买房，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新自由主义的相对“繁荣”。在实际工资停滞或下降的同时，美国工人阶级通过消费大量的来自中国、越南、孟加拉、印度、墨西哥等地的廉价消费品，间接地分到了世界剩余价值的一杯羹。

但是，这个新自由主义的社会“妥协”格局，在 2008-2009 年世界资本主义危机以后就完全破裂了。即使是以借债或者“金融创新”的方式，美国资本主义也无法将工人阶级容纳在自身的社会妥协范围内。大批原来社会地位处于“中等”的工人阶级家庭陷入绝望，一部分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化；而在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具体条件下，由此而形成的阶级矛盾激化在短期内又不可能造成积极的、革命性的变化。

美国的工人阶级和“进步”社会运动

马克思主义者都知道，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曾经提出了著名的“无产阶级终将成为资本主义掘墓人”的伟大设想。世界历史的实际发展比马克思所设想的要复杂。一直到二十世纪中期为止，无产阶级化的进程主要限于处于世界资本主义核心地位的一部分西方国家。由于世界范围的剩余价值高度集中在少数西方国家，这就使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将所掌握的超额剩余价值的一部分拿出来，进行一定范围的社会改良，并逐渐消蚀西方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精神。

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而不是从话语、文化领导权等唯心主义观点出发），这是西方工人阶级自十九世纪末期以来逐步放弃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原因。即使是今天，相对于亚非拉的广大劳动群众，美国工人阶级（更不必说小资产阶级）仍然享有巨大的物质特权。在许多美国工人看来，从他们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直接生活经验出发，改善他们物质生活条件最直接、最便利的方法，不是社会革命，而是恢复他们对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垄断地位；而要恢复他们对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垄断地位，就要把被少数族裔“抢走”的工作岗位抢回来，就要把移民工人挡在外面，就要沿着美国边界建起一堵墙。这部分工人阶级，是特朗普的主要选民基础。

另一方面，美国的以小资产阶级为主的“进步”社会运动，早已经与工人阶级渐行渐远。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的民权运动、妇女解放运动、环境保护运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起到了巨大的进步作用，对于此后相当一个时期世界范围进步运动的发展也产生了积极影响。但是，在新自由主义时代，美国的“进步”运动也在相当程度上起了变化。一部分六十年代的积极分子，被民主党收编，变成资产阶级用来欺骗、操纵小资产阶级和底层工人阶级的职业政客。争取妇女解放、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逐步堕落为“身份政治”。这种“身份政治”，一方面反映了在新自由主义时代，一部分新形成的小资产阶级要求资产阶级扩大其对小资产阶级的容纳范围、为新形成的小资产阶级（往往是来自女性和少数族裔）提供相应的经济和政治特权（有点类似于中国的自由派分子向共产党要“民主”但实际上丝毫不关心劳动群众的民主权利）；另一方面，迎合了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资产阶级的需要——这种需要就是，一方面向有廉价劳动力的地区资本转移，另一方面直接从外

国（如墨西哥）引进廉价劳动力，并将现有的尚未充分利用的劳动力（女性劳动力）充分利用起来。

在美国现有的阶级斗争条件下，无论是工人阶级企图恢复“黄金时代”的徒劳努力，还是以小资产阶级为主（并且裹挟一部分底层劳动群众）的“进步”运动，当然都不可能带来积极的社会变革。但是，二者，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造成资产阶级政治秩序的混乱，并且随着美国阶级矛盾的激化，使得资产阶级丧失有效解决自身政治问题的能力。

在 2016 年大选中，特朗普上台，这不仅是完全出乎美国资产阶级预料的，而且是美国资产阶级对政治过程失控的结果。特朗普本身是个大资本家，他的“内阁”也将由许多大资本家和帝国主义将军们组成。但是，这个“内阁”是否还有能力维护资产阶级的整体和长远利益而不仅仅是一部分资本家的眼前利益，则是大可疑问的，也是像《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这样的“自由派”资产阶级报纸所忧心如焚的。

如果说，路易·波拿巴还是一个真实的资产阶级将军，掌握着实际的军事力量，头上还戴着伯父“第一帝国”的光环；那么，特朗普，就完全是一个政治小丑，其背后，本来没有任何真实的社会力量的。但是，在美国目前的阶级斗争形势下，特朗普使得美国资产阶级内部原有的妥协格局和游戏规则被严重破坏了，将各资本家集团之间的矛盾公开暴露出来。这样的资本家集团之间的厮杀，除了使美国资本主义陷入混乱以外，有可能在长远为世界范围的进步变革创造有利条件。

比如，到目前为止，在美国资产阶级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华尔街金融资本和硅谷高技术集团。这部分资产阶级的基本利益在于继续推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政策：对外，一方面继续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政策，保持对中东的控制，另一方面也不得不实行一些有秩序的战略退却；对内，则为了收买小资产阶级以及扩大来自底层的廉价劳动力供应，愿意在种族、性别等方面实行一些较为“进步”的社会政策。

特朗普政府到底将实行什么政策，他想要实行的哪些政策又能够真正地实行下去，还有待观察。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在一部分制造业资本家的压力下，特朗普可能实行一定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在一部分工人阶级的压力下，特朗普可能实行一定的限制移民的政策。这两项政策，如果在一定程度上落实，客观上都会起到瓦解新自由主义全球秩序的作用。在能源工业资本家的压力下，特朗普已经决定要全面解除环境方面的管制。在短期，

这当然会大大加重世界环境危机；但是，从长远来看，这未尝不可以对环境保护积极分子起到教育的作用，用现实的经验来说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不可能克服人类所面临的环境危机的。在世界范围，在不同资本家集团的矛盾斗争中，特朗普既可能卷入新的军事冒险，也可能在事实上实行全面的战略收缩；无论哪种情况，都会导致美帝国主义加速衰落，从而有利于世界人民的进步斗争。

十九世纪的法国，阶级斗争虽然激烈，却仍然处于欧洲和全球资本主义的上升时代；二十一世纪的美国，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固然绝望，资产阶级的前途也不光明，无论美国和全球的资本主义都已经走上了衰亡的不归路。在这个意义上，如今的美帝国主义其实比法兰西第二帝国的“纸房子”更加虚弱。

世界的希望在东方

作为中国的马列毛主义者或者进步分子，我们要把主要的工作精力用于中国人民的事业。这不是由于我们在精神上狭隘，而是由当前世界阶级斗争的实际情况所决定的。

在未来相当一个时期，美国和西方的工人阶级不大可能主动地完成他们那里的革命变革。拉丁美洲、南亚、俄罗斯等地方的进步斗争也有各种各样的暂时难以克服的困难。但是，世界资本主义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在世界的东方造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伟大的工人阶级队伍。这个地方的无产阶级已经壮大，并且其力量将逐步增强到资产阶级无法简单用镇压的方法来摧毁的地步。另一方面，这个地方的资产阶级虽然貌似“强大”，实际上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其所拥有的有限的剩余价值不足以将庞大的无产阶级队伍完全收买下来。这样，在世界历史上，就第一次出现了与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论述的几乎完全吻合的社会和经济状况。

东方的无产阶级将用自己的伟大实践来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并为美国和西方国家的人民指明道路。

不是社会主义，就是野蛮 —— 一场关于二十一世纪的对话

2017-2-12

原作者: 拉库斯、李民骐

译注: 瑞尔夫·拉库斯 (Ralf Ruckus) 是德国工运活动家。李民骐是美国犹他大学经济学教授, 他所撰写的《中国和二十一世纪的危机》由英国的冥王星出版社于 2015 年出版 (Minqi Li, *China and the 21st Century Crisis*, Pluto Press, 2015)。此前, 《红旗太平洋》公众号已经发表了拉库斯为李民骐教授的新著所撰写书评的中文译稿 (分上、下两部分)。

2015 年 12 月 12 日, 在德国科隆举办了一次主题为“世界体系中的中国资本主义: 新视角”的国际研讨会。同日, 拉库斯对李民骐教授做了长篇采访。这次长篇采访的英文整理稿和拉库斯的书评后来都发表于德国《社会历史网刊》

(https://sozialgeschichteonline.files.wordpress.com/2016/06/sgo_19_2016_ruckus_china_li-minqi.pdf)。

在这次采访中, 拉库斯和李民骐就世界体系、经济危机、气候变化、社会变革的策略、共产主义以及毛泽东主义等问题展开了充分、热烈的讨论。这里发表的是此次采访的中文译稿。下面, 拉库斯简称“拉”, 李民骐简称“李”。

拉: 在你的最新著作中, 你根据一系列数据将中国仍然划分成一个外围国家[1]。当你写到其它时期的另外一些国家时, 你有时会允许一些例外, 不仅仅用国内生产总值 (GDP) 一类的数据做标准, 你将一些在世界体系中有一定重要性的国家也划分为半外围国家 [2]。考虑到中国的全球地位, 你为什么要坚持将中国列为一个外围国家而不是一个半外围国家呢?

李：事实上，在另外一些文章中，我大概已经将中国称呼为是一个半外围国家，而不再是外围国家。就世界体系的方法来说，在核心、半外围和外围之间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是有争议性的。核心与外围之间的关系是相对明白的，就财富集中于核心、剩余从外围向核心转移来说。在二十世纪，半外围地区常常是这样一些地区，当核心资本主义国家遭遇危机时，全球资本便向这些地区转移。核心资本主义国家需要建立起新的有利可图的垄断部门；与此同时，它们需要转移旧工业。像苏联和拉丁美洲这样的国家是二十世纪中期的主要受益者。

我尝试用同样的框架来分析中国。当我开始做这项研究的时候，我完全以为中国可以被划分为半外围。当中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资本主义转型的时候，情况是清楚的：中国仍然是外围的一部分。但是到了本世纪初，就不那么清楚了。如果你采用原来的麦迪逊的数据，你大概会发现，中国现在已经成为半外围的一部分了。但是麦迪逊的数据系列到 2008 年就截止了[3]。所以我只好用世界银行的数据[4]。当我采用世界银行的数据时，我发现，中国（的人均 GDP）仍然显著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我试图与此前各个年份所采用的标准保持一致；另外，我想要避免这样一种困境，倘若我将中国提升为半外围，另外一些人均 GDP 比中国还要高的国家也必须要被作为半外围。

我还计算了国家之间的不平等交换。我发现，目前来说，中国已经处于可以“剥削”诸如非洲和南亚等外围国家的地位，就是说，中国可以用较少的劳动来交换非洲或者南亚的较多的劳动。但是，平均来说，中国仍然需要用两单位的本国劳动来交换一单位的世界平均劳动。所以，从技术观点看，中国仍然是外围的一部分。但是中国正在上升为半外围。这一变化本身就足以引起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根本变化。

拉：这本新书（译注：即李民骥教授的新著《中国和二十一世纪的危机》）新在什么地方？比如，和《中国的兴起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没落》相比较。根据你的数据和计算，你预言，中国将在未来五至十年爆发重大危机，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会在 2030 年左右陷入最后的危机，是这样吗？你能解释一下这些预测吗——做这样的预言应当是很危险的吧？

李：非常危险。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终极性危机”或“结构性危机”是另外一个问题[5]。但是，就中国来说，基本的问题是，中国目前的资本主义积累能否在未来维持下去。中国在过去几十年的资本主义积累是建立在对一支庞大的廉价劳动力队伍的密集剥削、进入西方市场的便利、资源耗竭和环境恶化的基础上。所有这些条件都在被削弱。这是出发点。

还有其它的具体指标，包括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比如以非农业就业占全部就业的比例作为无产阶级化程度的粗略指标。我们发现，中国已经进入了这样一个区域，现在大致相当于巴西、南朝鲜和波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情况。所有这些国家都是当时的半外围国家，都经历了严重的政治不稳定。如果中国遵循同样的规律，可以预期，它将在不久的将来遭遇相当程度的政治不稳定。此外，让我们考虑一下对廉价劳动力的剥削，这是中国资本积累的基础。正是因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成功，中国的社会结构被改变了，于是，现在就有了一支庞大的工人阶级开始要求经济和社会权利，向资本家阶级施加压力。

我的研究表明，中国的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自2010年以来一直在上升。这就给资本家的利润率造成压力，利润率正在快速下降。自2007年以来，利润率急剧下降，并且将要进入这样一个区域；在历史上，这个区域是与美国资本主义的历次重大危机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中国资本主义将要发生经济危机的迹象。

还有各种指标表明，中国的生态系统、中国对各种进口能源资源的需求在将来或许也是不可持续的。归纳起来说，看起来，在五至十年后，中国资本主义将很难继续复制它曾经赖以支撑资本积累的各种条件。

拉：你提到，在以往的、类似的危机中，资本主义有一种暂时的解决办法，那就是所谓的“空间修复”。比如，通过在半外围地区，或者在原来不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范围以内的地区，扩大资本主义生产。现在，你说，将不会再有又一次空间修复的机会。你为什么这样认为？

李：简单说，中国是如此之大。历史上，空间修复曾经起作用，因为它带来了新的廉价劳动力和原材料的来源。让我们来看二十世纪晚期的全球资本转移，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制造业中心提供了巨大数量的廉价劳动力，其规模大致相当于所有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国家

的全部劳动力之和（译注：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英文缩写 OECD，是由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参加的经济机构）。那么，现在，基本上不可能再找到（与中国）规模相当的劳动力队伍而又具备资本积累的其它必要条件，像经过充分开发的工业基础设施、素质良好而守纪律的劳动力、廉价而充裕的能源供应，以及稳定而有效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一方面。除此以外，还有生态制约。中国自身已经遇到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如果我们想要到中国以外的地方，想象一下，比方说，由印度来复制中国在过去几十年做过的事情，那么，能源需求、二氧化碳排放，等等，肯定将使全球生态系统崩溃，并且，不可避免地，导致气候灾难。

拉：你强调，资本主义已经遇到了经济的、生态的和社会的极限，只有向社会主义过渡。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中，关键的问题是，能不能有另外一种社会，建立在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因为有了新的生产力，因而可以对物质生产按照另外的方式加以组织；在大幅度削减直接形式劳动的基础上，从而实现共产主义。你看会有这样的变化吗，这样的决裂，一种新的生产方式？

李：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是的，当然。问题是，什么样的（新的生产方式）。我想，平心而论，按照马克思对他那个时代资本主义的理解，他对生产力发展的潜力是很乐观的。虽然马克思讨论了很多资本主义的消极面，我想，他没有想到，资本主义已经将我们带上了气候灾难的道路，可能会威胁到人类文明的存续。马克思的看法是，因为资本主义已经为非常高度的劳动生产率准备了物质基础，就可以大幅度地减少每个人的劳动时间，因而消除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分工，而这将最终开辟通往无阶级社会的道路。

现在，我们面临着全然不同的历史挑战。这样的、基本的挑战，就是资本主义已经造成了巨大的全球生态危机，如果这一危机得不到解决，那么，人类文明，如我们所知道的，就有可能无法维持下去。当前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决资本主义的这一危机，这是资本主义留给我们的不幸遗产。

我们怎样来理解“生产力”？在斯大林主义传统中，它变成了一种庸俗的概念，基本上就是指经济增长。但是，如果我们从更加广泛的意义上来认识生产力，它实际上是关于

人们如何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而生产基本的物质产品。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就必须与自然发生交往，所以生产力实际上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些条件如何变化，不仅取决于人，还取决于自然界对于人类的影响会做出怎样的反应。其结果，可能是进步，也可能是巨大的倒退，比如，因为环境危机（而引起的倒退）。在那样的情况下，问题是：我们具备那种为了人类文明的可持续所必需的平衡力量吗？这是对生产方式的最基本要求。出于这个原因，我们需要一种新的经济制度，这个经济制度不再追求无限制的资本积累——如资本主义那样。取而代之的是，我们要将社会的剩余产品置于社会的民主控制之下，用之于生态可持续性以及满足人民基本需要的目的。

在这个前提下，即除了生态可持续性以外，我们是否还可以实现共产主义，那样一种无阶级社会，为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提供最大的可能？这个问题，只能是留给将来的人们为之奋斗。他们能不能做到不仅是将剩余产品置于社会的民主控制之下而且将其用于为无阶级社会创造条件？只有未来才能回答。

拉：你的观点好像是，马克思想要做的，基本上是这样，利用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但是改变其控制方式，这是第一步；然后再实现共产主义，这是第二步。如果是这样，你好像又在重复那种“两阶段论”。在我看来，这会造成许多问题，因为我们有过这样的许诺，不仅是毛泽东主义而且是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都许诺要在未来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然后失败了。他们失败了，就是说，他们从来没有实现第二步。那么，你为什么还要坚持“两阶段论”？

李：不，这不是“两阶段论”。他们（译注：指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没有建立起无阶级社会，但是他们当然完成了他们可以完成的历史任务。就是说，动员资本资源以实现工业化。这里，我不是要说，先实现工业化，再建设共产主义。我要说的是，首先实现生态可持续性。这恐怕需要经济零增长甚至于“负增长”。在这个前提下，我们还能够拥有为一个无阶级社会所必需的物质条件吗？这是一个开放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够一方面限制物质消费水平，另一方面减少人们的劳动时间，这仍然是有可能的，但是，这绝对不容易。当马克思和恩格斯讨论这个问题时，他们不仅认为资本主义可以实现高度的劳动生产率，而

且认为在资本主义灭亡以后，共产主义可以实现更快的劳动生产率增长。这是因为他们相信，技术进步的潜力实际上是无限的。而现在，我们要面对现实，那就是可能存在着对技术进步的终极限制，我们无法超越这样的限制。

拉：你的预测建立在你以往趋势的判断上，这些趋势，在你看来，将会在未来继续下去。然而，某些过去的趋势不会继续下去，而是会被新事物所代替，这难道不是革命发展的思想的一部分吗？这涉及到对发展的生态限制。比如，十八世纪中期，没有人会预想到，严重的木材危机可以通过改用煤炭而得到解决。在十九世纪末，没有人会预想到，不列颠帝国的军事力量及其非常强大的海上力量可以被空军和火箭等武器所代替，而石油是后者的燃料。所以，技术发展是不是有这样一种不可预测性，你如何将这些包含在你的分析中呢？

李：首先，所有人都是从过去获得知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在今后一段时间继续生活。至于我是否依赖于以往的趋势，最大的现有的趋势，恰恰就是资本主义一直存在到现在。而我的预测是，这个趋势将要终结，为此我承担了理论的和政治的风险。确切的说，当然，没有人可以预测未来的细节，但是我们尝试着，根据我们从过去和现在所了解的，来认识历史可能性的范围。

关于能源过渡以及某些军事装备的变化，这确实是有意思的。说到煤炭代替木材、石油代替煤炭，等等，几年前，我听过一个加拿大地质学家 David Hughes 的报告。他说，这样一种常见的关于这些事情的想法其实并不准确。事实上，今天我们比十八世纪要消耗更多的以木材为形式的生物质能。我们所消费的煤炭，显然比十九世纪要多得多；我们所消费的石油，也超过二十世纪中期。到目前为止，资本主义增长还没有实现过用新的能源形式来代替旧的能源形式，而只不过是新的能源形式累加到原有的能源形式上。

现在，又有了气候变化的问题。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实现“去碳化”（decarbonization, 译注：即减少可以产生二氧化碳排放的“化石燃料”，如煤、石油、天然气，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有人认为，靠太阳能和风能就可以解决问题。但是，即使是从资本主义的历史来看，我们所要解决的也是非同寻常的问题。我们不仅需要将新能源

累加到旧能源上，而且还要实际上减少旧能源的消费；并且需要迅速地减少，足够迅速，以确保全球变暖不超过两摄氏度。就我个人来说，我认为这个两摄氏度的目标，将很难达到，即使我们明天就有了生态社会主义（也是如此）。然而，如果我们幸运的话，我们或许可以避免一些最恶劣的气候灾难，比如亚马逊热带雨林的毁灭，比如海平面上升 25 米。这取决于我们能否在未来几十年完成为此所需要的社会过渡。

拉：所以你不认为，可以有那么一种技术步骤或者“更新换代”，或许可以停止气候变化的进程？

李：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一方面了解气候科学，另一方面考察能源数据，无论有什么样的新技术。我们现有的经济，其基础设施是依赖于化石燃料消费的。你不可能把这些基础设施都拆毁，只能每年替换其中的一小部分。即使我们假设新建设的基础设施都采用了奇迹般的新技术，能源过渡也需要几十年的时间。

拉：你对于在 2015 年 12 月初在巴黎举行的气候会议所达成的协定，有什么想法？在你的新书中，你做出了与你在 2008 年出版的那本书（《中国的兴起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没落》）中相类似的预测。但是，那个时候，还没有一个可以与这次相比的各国政府之间关于减少气候变化的协定。那么，就政府这一级别来说，他们是否已经认识到，一定要做些什么？他们所谈论的目标与你所说的一样，使全球变暖不超过两摄氏度。显然，这些世界领袖们，包括中国领导人，是要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寻找解决办法。他们不会超出这个范围。你对这些政府级别的讲话、协定，怎么看，比如这次巴黎会议？

李：在巴黎，各国政府达成了一个没有约束力的协定；原则上，他们致力于将本世纪末的全球变暖限制在两摄氏度以内。有一个气候行动追踪网站，这个网站评价各个国家的承诺。按照他们的估计，如果将所有国家的承诺加在一起，这将导致 2100 年的全球变暖与工业化以前时代相比达到 2.7 摄氏度[6]。现在的这些承诺，主要是基于各国对于 2030 年以前的排放路径所提出的保证。但是，实际的发展还取决于对 2030 年以后的经济增长做

出怎样的假设。为此就需要对 2030 年以后的排放做出各种各样的假设。即使我们假设最好的可能的情况，全球变暖也会超过两摄氏度，并且要说明的是，2100 年以后全球变暖还会继续。这样就会以危险的程度接近三摄氏度。这可能会引起全球变暖失控。所以，像文明毁灭那样的巨大危险是不能排除的。

拉：在你的新书的最后一部分中，你设想了各种情景，这些情景最后都导致建立起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如果回顾历史的话，正如你前面提到的，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资本积累的基础上的。经济增长、大规模工业化、建设重工业，所有这些，都不仅发生在中国，而且发生在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你相信，应当有，将会有，那么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政权，是什么使你相信，他们将会找到一种更好的解决办法，比现在的资本主义领袖们所正在讨论的还要好？你是否知道，有任何的社会主义理论或者实践，这些理论或者实践使你认为，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将会与旧的有所不同。

李：如果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继续存在的话，那么未来的任何单个的社会主义国家想要有所作为，都将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存在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限制。如果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崩溃了，未来的社会主义政权就将有机会，以另外的方式来使用剩余产品，不是用于资本积累，而是用于生态可持续性。就是说，它将不再追求经济增长。历史社会主义不得不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竞争，包括经济方面和军事方面。所以，无论统治精英的主观愿望如何，要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存在下去，就必须动员资源用于资本积累。这是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合理性所在。

在二十一世纪，首要的问题是，我们面临着全新的历史挑战。如果我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为事物的实际发展所证实的话，政治不稳定，特别是在中国和亚洲，将导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其它各个部分的不稳定。于是，新的社会主义国家将不再受到资本积累（这样一种迫切要求）的制约。如果有了一定的民主觉醒，人民群众了解到了生态危机的巨大危险，那么，在对剩余产品实行民主控制的条件下，就可以走向这样一条道路，即将剩余用于生态可持续性的目的。归根结底，要对人民有些信心。

拉：一般来说，从民族国家的角度来思考未来，总是成问题的。这在你的新书中也有反映。你所讨论的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崩溃以后的社会主义的未来，仍然是从“国家”的角度。对我来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崩溃，就意味着国家的崩溃。只有在“统一的世界”，即在废除国家以后，才可能建立起那样一种可以提供生态可持续未来的另外一种生产方式。你为什么要坚持以国家为基础的发展呢？

李：我不坚持。但是，我不知道，到那时，将会是一个世界，还是许多个世界。我们为民族国家的消亡而奋斗。但是，我想，在我的有生之年，我们将不会看到民族国家的终结。在可预见的将来，社会斗争将是在特定国家范围内进行的。可以希望的是，更加广泛的历史进程将不仅带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灭亡而且消除民族国家之间的边界。

拉：在我看来，后者是前者的条件。比如说，当我们讨论今天的工人阶级运动的时候，在欧洲有五十个民族国家，还有欧洲联盟这个超国家的机构，消除（国家）边界的思想对于任何超越资本主义的前景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李：是啊，但是有实际的问题。设想一下，在不远的将来，在中国有了一个社会主义政府（这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还没有最终垮掉，因而中国仍然被资本主义经济包围着。在这种情况下，仍然会存在着这样的问题，要在世界市场上竞争，需要进口，比如说，需要从德国进口机器，从中东进口石油。某些社会阶层可能还要求获得奢侈品。

遗憾的是，很难想象，新的社会主义国家所能够直接采取的办法将会与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有什么不同：首先，要减少一切不必要的进口，比如说，奢侈品，还要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依赖。可以希望的是，这将会导致资本主义国际分工的瓦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将造成新的条件，促成全球的变化，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转变，可能先是在半外围，然后是外围，最后是核心。在这样的基础上，也许可以创造一个新的、民主的世界未来。所以，存在着实际问题。我不能肯定，我所设想的是最好的或者最优的办法，但是我们必须要解决实际问题。

拉：这些都是预测或者猜测，但是我会把国家的解体放到一个更早的阶段。

李：但是你不需要政权吗？

拉：需要。但是，问题是，要创造另外一种形式的政治权力，也包括在地理方面。在我看来，只有一个全球化的世界才有未来，包括知识、技术以及其它方面的全球交换。而国家，像它现在这样的结构，必须要被替换。

李：说到未来的革命，进行革命的将不是抱着良好愿望的共产主义者所希望看到的理想的工人阶级，而是这样一种工人阶级，它将带有这个阶级的所有的历史局限性。人们必须要从实践中学习。

拉：是这样，但是，让我们不要用意识形态的方式来讨论这个问题，让我们看看社会运动的历史经验。让我们回顾一下自 2010 年以来的运动，看起来，对于民族国家的局限性以及全球联系的必要性，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有些斗争的实践，已经是“全球”的了，即使它们不直接相互联系或者协调，它们还是可以在不同的地方按照相似的方式进行。

李：但是，为了要实现全球的社会主义转变，起初的步骤可以是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在一定程度上“脱钩”（delinking, 译注：即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切断联系），并对资本流动建立某种控制，以防止资本家将钱转移到“安全”地带。在表面上，这是走向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反面。

拉：或许更好的办法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使用价值的交换，而不是通过货币。

李：最终来说，是这样。

拉：好了，看来我们有一些不同的想法。回到前面的问题，你设想了几种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情景。Beverly Silver，还有 Giovanni Arrighi（译注：Beverly Silver 是美国社会学家；Giovanni Arrighi 即乔万尼·阿瑞吉，意大利社会学家，世界体系理论创始人之一，已故），在分析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及其未来时，也设想了几种情景。但是，他们还提到另外一种情景，战争。在一种情况下，你提到了内战。当我们讨论后资本主义时代的前景时，这并不意味着任何一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将必然代替资本主义。那么，在你的新书中，你为什么没有对此有所阐述？

李：不可能用理性的方式来阐述这个问题。比如说，原子弹在北朝鲜爆炸，这并不是完全不可以想象的。但是，你如何阐述它？

拉：也许是人们用机关枪相互屠杀，倒不一定是整个世界的毁灭。

李：说到机关枪，地缘政治方面不稳定的形式，将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或者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有很大的不同。不会是采取大国之间决战的形式。而是这样，地缘政治的不稳定将主要发生在世界上的这样一些地区，在这些地区，积累体制垮掉了，具体来说，就是富有能源资源的中东地区。当然，对于非洲和欧洲，其影响是巨大的。这将是难以控制的。因为随着美国霸权的衰落，美国已经不可能加以控制；至于其它大国，如俄罗斯或者中国，想要有效干预，也是很难的。在这样一种形势下，有着巨大的不确定性。比如，在沙特阿拉伯也许将会有一场革命。由于这样的巨大的不确定性，目前，我看不出怎样才能以进步的方法来解决中东地区的不稳定。当然，这也使得欧洲的进步变革更加困难。在这种形势下，一切都取决于在世界其它地区将会发生什么。最主要的，就是中国将会发生什么。只有在这里，才有一个正在大规模形成中的工人阶级，尚未登上政治舞台，但是这已经为期不远了。这里，在一定意义上，我们看到，中国的社会变革是最接近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设想的那样。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生过马克思所设想的那种经典的工人阶级革命，但是这可以发生在中国。由于中国在全球资本主义分工中所起的中心的作用，

这会不会进而造成全球的进步变革的可能性？这将是我們为之奋斗的。当然，这里没有历史宿命，但是，至少有着显著的可能性，这一切是可以发生的。

拉：在这本书中，你说毛泽东主义的“新左派”是今日中国一支显著的政治和思想力量。就我自己的经验来说，我们无法谈论一种“毛泽东主义”，而是必须要谈论各种各样的“毛泽东主义”，它们实际上各不相同。我也会小心翼翼地，不去贸然预言毛泽东主义在未来将在中国发挥多大的作用。我们可以同意的是，在中国，没有任何一种左派的流派，比毛泽东主义的流派影响更大。这与中国左派的历史以及毛泽东主义的历史阶段有关；在历史上，其它的流派没有得到发展，更谈不上壮大。毛泽东主义的信念之一（也是其主要基础）便是民族主义，不仅仅是社会主义，并且这也不仅仅是就历史上的毛泽东主义来说。

李：是的，我说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是一种激进化的民族解放运动。

拉：好，那是就过去来说，包含着当时的一切矛盾，现在要探讨的是未来，以及你关于毛泽东主义的“新左派”将起到决定性作用的预言。在我看来，我们必须考虑到，当前的毛泽东主义左派中的大多数在某种意义上对于强大国家、权威主义统治等想法抱有同情，他们并且辩护和鼓吹中国的国家利益。这是与全球变革的思想相冲突的，后者要建立在平等以及工人阶级超越（国家）边界的共同利益的基础上。你对这种民族主义，有什么看法？

李：我们看到，有各种各样的毛泽东主义派别。乌有之乡是其中之一，但是它的影响力已经显著下降[7]。2012年以前，有几个小组，乌有之乡是其中最大的。如果你看一下那个时候毛泽东主义小组的社会基础，主要是包括这样几个部分：我们所说的“老工人”（原来国有部门的工人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老战士，对共产党的领导失去幻想的共产党的老党员，还有一些边缘化的知识分子和青年。所以它的基础主要是工人阶级中一个特别的部分以及城市人口中相对边缘化的部分，如文化大革命的老战士以及小资产阶级的某些部分。在这些社会阶级中，民族主义确实有一定的影响。但是我必须要说，对于其中的一部分来

说，民族主义是他们反对帝国主义的表达方式，或者，在一定程度上，如果你愿意这样表达的话，是“有中国特色的”反新自由主义。

自 2012 年以来，中国左派的构成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那些相对旧的左派团体（以老工人、老干部、文化大革命老战士为基础的），其影响下降了；他们被新一代的左派团体所代替，后者主要由青年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组成。这些新的团体与新一代工人阶级有着更加密切的联系。在中国，因为你所提到的历史遗产，大多数左派分子自称为毛泽东主义者，虽然还有一些自称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大多数还是声称自己是毛泽东主义者。但是，实际上，正像文化大革命期间所发生的那样，每个人都声称自己追随毛泽东的思想，但是实际上，他们按照符合他们自己目的的方式来执行或解释毛泽东思想。在今天的中国，你必须认识 and 了解某一个具体左派团体的实际的阶级基础和政治内容。就他们的思想表达来说，这些新的左派团体，一般来说，更接近于传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是我们所理解的毛泽东主义。还有一些受到最新的国际左派思想的影响，虽然这还仅限于少数人。重要的是，这是这样一种社会运动，它反映了城市中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中进步派别的想法和愿望。这个运动有可能与在工人阶级基础上的新一代社会运动建立联系并团结起来。如果是那样，这将会是影响中国未来的真正的社会变革力量。

注释：

[1] 见 Minqi Li, *China and the 21st Century Crisis*, p.75, London: Pluto Press, 2015.

[2] 同上，第 199-200 页。

[3] 译注：“麦迪逊的数据”指的是安古斯·麦迪逊为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编纂的《世界经济历史统计》，一般认为是最权威的长时期（从公元 1 年至 2008 年）国际经济统计资料。这些数据可以在这里下载：Angus Maddison, “Statistics on World Population, GDP, and Per Capita GDP, 1-2008 AD.” <http://www.ggdc.net/MADDISON/oriindex.htm>

[4]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http://databank.worldbank.org>

[5] 关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危机”，见 Immanuel Wallerstein, *Utopistics, or Historical Choice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8;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Decline of American Power: The U.S. in a Chaotic World*.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3; and Immanuel Wallerstein et al., *Does Capitalism Have a Fu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6] 见 <http://climateactiontracker.org>

[7] 中国共产党的报纸《环球时报》英文版最近发表了一篇关于“乌有之乡”的报道：Huang Jingjing, “Maoist Websites Hang On despite Shrinking Public Influence,” *Global Times*, May 23, 2016. <http://www.globaltimes.cn/content/984698.shtml>

中国应“弃朝”还是应“灭朝”

2017-2-24

原作者: 张志坤

编者注：此文是红色中国网于 2017 年 2 月转载的，当时，中国资产阶级正积极配合美帝制裁朝鲜。这篇文章说明中国资产阶级曾经一度利令智昏，准备在美帝国主义的威逼利诱之下完全抛弃朝鲜，甚至于帮助美帝推翻朝鲜民族主义共和国。

中国究竟应该拿朝鲜怎么办呢？这是中国国内有关朝鲜问题争论得最激烈的课题。

关于这一命题，答案大致上有三种：

其一，支持朝鲜说

坚持这种说法的人认为，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地缘安全上看，中国都应该支持朝鲜，因为这将增强中国同美日韩博弈的砝码，也有利于抗衡普世潮流对中国的侵蚀。利用朝鲜的人力物力，支持朝鲜牵制美国，将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比中国自己出手还划得来，也更具有战略弹性，效益十分明显，便宜也相当可观。所以，这些中国人坚定地认为，朝鲜是中国宝贵的战略资产，现如今地位重要，未来将更是关键性战略高地。中华民族在历史上从未置朝鲜于不顾，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当代中国不能数典忘祖，崽卖爷田，把这块中国传统势力范围内的区域弃置脑后。

其二，放弃朝鲜说

有一些中国人主张，中国应该从战略上放弃朝鲜。这些人一直都可以制造这样的舆论，即当年所签订的《中朝友好互助条约》已经属于旧时代的产物，中国不会再把这个东

西当回事，现如今中国同朝鲜之间的关系就是正常国家关系。

这是中国弃朝论比较集中比较具体的表达。一些人之所以要进行这样的表达，一方面是在说给美日韩听，意思是要他们放手对朝鲜采取举措行动，不必担心中国会介入干涉；另一方面，这也是在对中国政府喊话，他们经常危言耸听地说中国外交被朝鲜所绑架，于是用各种办法呼吁中国政府公开废除这个东西，以便把朝鲜彻底交给美日韩来处置。

这种弃朝论，主要是一些公知与右翼学者们的意见。

其三，灭掉朝鲜说

这种说法就是著名的灭朝论。自朝鲜进行核试验以来，就有中国人如丧考妣地到处宣讲，说当今中国最大的威胁来自朝鲜，东三省的老百姓已经因此纷纷出逃了，中国的安全已经危如累卵，振兴东北也因为朝鲜威胁而无望，中国经济就此遭遇沉重的打击。所以，为了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为了拯救世界拯救人类，中国应该同“国际社会”一道，坚决对朝鲜采取断然的措施，一劳永逸地解决朝鲜问题。

持这种观点的人，主要是一些激烈反华与反共的人士，但在朝鲜议题上，他们却表现得十分“爱国”，并且“爱”得要死要活，“爱”得气势汹汹，对任何提不同意见的人都像疯狗一般扑上去撕咬。

那么，未来将是怎样一种情形，中朝关系将向着什么方向发展呢？

中国政府已经在援朝与弃朝之间徘徊好多年了，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现如今中国更多地是在向弃朝方面偏移，这也有目共睹了。在中美关系“谁也离不开谁，只能合作，除了合作别无出路”的基本理论逻辑下，中国不可能因为朝鲜而干犯美国。所以，不管中国历史上曾经有多少次援朝，但现如今的中国再次援朝的可能性已相当微弱。更严重的是，

有朝一日，中国可能将不得不做出抉择，要被逼无奈地去选择到底是“弃朝”还是“灭朝”。这样的危险相当大，未来还会更大。

法西斯又来了？——不是人民怕纳粹，而是纳粹怕人民

2017-3-4

原作者：“装甲巡洋舰曙光号”

狼烟再起？

最近的世界颇不太平，美国的特朗普，英国的梅，两个右翼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已经当朝执政，日本的安倍晋三也不守规矩，各路保守派头头们也蠢蠢欲动，法国，匈牙利，奥地利等国的极右势力也有当权的可能。有些人看到这副光景就被吓怕了，仿佛希魔（希特勒）转世，昭和（二战时期日本天皇）再临，墨索里尼（意大利法西斯头目）的棺材板儿也按不住了，世界将重新落入法西斯势力之手，只差一个“国会纵火案”，这帮宵小之辈就能修宪自立一样。人民将陷入无限的苦难，强大的法西斯国家机器将把每个人牢牢锁住，历史将进入又一个黑暗时期，进步势力只能望而却步，任人宰割。

坦率地说，这纯属《1984》综合征。没有经历过法西斯政权的人们，总是倾向于把法西斯国家机器想象成为：（1）胆大妄为；（2）无所不能；（3）内部团结一致的钢铁政权。仿佛平日里经常打交道的占个茅坑不拉屎的底层官僚一下子就会变成铁面无私的忠诚爪牙一样。这些被吓坏的人们把平时所学的公共选择理论（国家公务员为自己而不是国家服务，国家机器相当低效），阶级分析，乃至初中历史都忘到了九霄云外，对他们来讲，法西斯俨然成为了一个不可以被分析的神迹。

一句话，他们怂了。**其实法西斯根本就不可怕**，让我们就来看看历史上最法西斯的国家纳粹德国在其最嚣张的战争时期（1939-1945年）都出了什么荒唐事吧。

为啥不早点动员？



战争总动员是一个国家权力全力战争、决不妥协的最终形态，其目的是动员一切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的因素为打赢战争服务。当出现世界大战你死我活的局面时，越早展开战争动员，就越能在物质上压倒对手。二战期间，英国于1939年，美苏于1941年各自参战时就开始了全面动员。但是战争动员意味着民用经济的萎缩，对普通群众讲，意味着每年只能添一两件衣服（质量也会下降），只能吃很难吃且没多少营养的食品（黑面包取代蛋糕，咸土豆取代香肠），取消大部分的娱乐（歌剧电影黑啤酒限量供应），停止供应民用汽油等一系列闹心的事情。一句话，生活水平会受到严重影响，严重的话会引起对本国政府的不满，导致士气下降乃至兵变等。对于参战国来讲，始终存在一个打败敌国和不被民众推翻之间的抉择。

纳粹德国对于这个问题有着惨烈的教训和清醒的认识。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由于过度的战争动员加上协约国的经济封锁，德国国内民众生活状况出现了很大的困难，而德国贵族军阀们仍然坚持压榨民众，试图攫取最后一点战争资源，导致国内后方不稳，前线士气崩溃。当德军统帅部命令帝国海军做自杀性攻击时，基尔海军基地的水兵们揭竿而起，反抗暴政，最终于 1918 年推翻了德意志第二帝国。

尽管后来的纳粹党把责任都推到了犹太人和德国共产党身上，说他们破坏战争导致失败。但是纳粹党十分清楚，**德国民众的不满才是帝国被推翻的根本原因**。因此，这个利用 1929 年经济危机上台的法西斯党一直把实现全面就业，维持民众生活水平当做维持自己执政地位的重要条件之一。所以，纳粹党才会实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重化军工投资以及一定程度上的劳资妥协政策。**纳粹党的阶级基础是大容克资产阶级，而构成其群众基础的，正是在其经济政策中获得稳定就业和以及生活改善的小资产阶级和部分工人**。一旦失去群众基础的支持，纳粹党被德国民众推翻只是个时间问题。

因为害怕民众的反抗，纳粹党不得不一再推迟战争动员。我们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是 1939 年 9 月 1 日打响的，可是**迟至 1943 年初，纳粹党都没敢实行战争动员，直到斯大林格勒打了场大败仗才开始动员**。这反映了法西斯国家机器对民众诉求的妥协。可就是这样，德国民众也不满意。在还没开始动员的 1939 年，德国未来的将星曼施泰因元帅就以一种“这届人民不行”的态度抱怨民众参战热情冷淡，步兵攻击精神太差，以至于有些部队居然还能被波兰骑兵吓个半死。

推迟战争动员的后果是严重的，纳粹德国在开战的前三年基本保证了民众生活水平不下降，而且新占领地区提供的农产品（乌克兰的小麦，法国的牛奶，荷兰丹麦的鸡蛋，巴尔干的水果等）纷纷涌上了德国民众的餐桌，掳掠来的占领区人民也有一部分成为了德国人的家庭仆役。但是由于没有开展动员导致的人力和物质不足，德军在前线的损失一直没能得到有效补充。导致 1942 年夏季攻势（第二次哈尔科夫战役-高加索战役-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兵力兵器疲竭，最终在斯大林格勒一败涂地。

由此可见，即使是法西斯政权，它在做出决策的时候，也不得不对民众的需求有所忌惮。它作为资产阶级政权，势必面临者镇压民众与讨好民众的选择。所以我们得出了第一个结论：**法西斯政权绝非能够为所欲为，它也有不敢做的事情。**

养那么多后备军干什么？

第二个典型事实是德国后备军的数量。从“德国国防军报告”网站中，我们可以找到各个时期德军人力分布的变化如下表：

年代	野战部队	后备军	空军	海军	党卫军	外国辅助人	非战斗人员	纳粹党官员	军工人员
1939	2,740	965	400	50	35	—	500	501	38,725
1940	3,650	900	1,200	250	50	—	550	362	35,014
1941	3,800	1,200	1,680	404	150	20	900	344	35,100
1942	4,000	1,800	1,700	580	230	70	1,200	348	34,528
1943	4,250	2,300	1,700	780	450	100	1,700	361	35,235
1944	4,000	2,510	1,500	810	600	350	2,300	343	34,815
1945	3,800	1,500	1,000	700	830	71	1,800	298	34,619

(人数皆为千人)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从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到1944年德国大势已去，德军野战部队数量一直在380万到400万之间徘徊，但是其后备军人数却从120万上升到了251万，而非战斗人员数量则从90万上升到了230万。两者相加，从1941年到1944年间，在野战部队数量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德军往后备军训练营和后方机关竟塞了**整整370万人**！在1941年，一个后方人员（后备军+非战斗人员）可以服务两个野战人员，**到了1944年，则需要1.2个后方人员服务1个野战人员**。如果说德军顺风顺水的1942年前出现这种现象无可厚非，但是即使在决定命运的1943年到1944年之间，德军在各条战线上兵力捉襟见肘，总野战兵力缩水了25万，但是后备军却奇迹般地增加了21万！这是一幅何等的“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模样。这些脱产的后方人员占用着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却对前线日益紧迫的战况毫无助益。一些人总把纳粹德国的官僚体系当做法西斯政权高效率的典范，但是看着这数以百万计的闲杂人等（约占战前总人口的5%），是不是也该清醒一下？

据统计，二战期间参与德国战争行为（军事，经济等一切相关行为）的总人数一直在4400万之间，排除俘虏和奴隶劳工，其人数也应占到战前德国总人口的45%以上。动员这么庞大的人力开动战争机器势必会面临着官僚主义，裙带关系，消极怠工等一系列的问题。谁都知道上前线的伤亡率极高，所以谁都想留在后方，当国家机器的执行人员自己及家人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时，各种通过走后门拉关系的方式留在后方的情况也会激增。这一方面说明法西斯官僚体系效率低下，另一方面，也是德国人民消极反战，拒绝为法西斯卖命的一种斗争方式。

由此，我们的得出了第二个结论：**法西斯政权的政令实行绝非如臂使指，它也有想做而力所不能及的事情。**

没跳过伞的伞兵与“空军装甲师”



第三个例子是关于德国空军的。我们可以看到，德国空军在鼎盛时期有 170 万人。而一个人所服务的飞机的数量却明显低于美苏等国，考虑到德国没有战略轰炸机这种需要好多人伺候的大家伙，其空军人员的服务效率要远低于美国。

为什么呢？因为德国空军有着非同一般的任务：地面作战。自 1941 年克里特空降战役德军伞兵精锐尽丧之后，伞兵就基本被当成步兵用了。然而，空军作为纳粹党的亲兵，与党卫军一样有着监视和制衡国防军（德国军官团掌控国防军，与纳粹党有一定距离，但他们也执行镇压民众和侵略扩张政策）的作用，于是一大批“空军野战师”被建立起来。这些空军野战师用的是最好的装备，享受的是空军的待遇，但为了抵制国防军的影响，他们的训练是空军自己完成的。这帮没有经过陆军专业训练也没有陆军老兵士官指导的新兵蛋子一上战场就被打蒙了，在斯大林格勒，四五个空军野战师被苏军打得七零八落。于是以后只能在北线的列宁格勒去打打那些饿的面黄肌瘦的苏军（如上图在北线诺夫哥罗德附近作战的第一空军野战师）。曼施泰因毫不掩饰自己对这些空军野战师的差评，他认为与其把这些精良的人员和装备组成一个个没用的空军野战师，不如把他们补充进陆军，空军野战师纯属是一种浪费。

但希特勒和戈林（纳粹党二号人物，纳粹空军头目）不这么想。他们需要手中掌握一只独立于国防军的武装，来平衡国防军军官团的势力，在未来国防军可能叛变时镇压他们。所以，空军不仅拥有了一般的步兵部队，还组建了直属空军的“赫尔曼·戈林伞兵装甲师”。作为一只给空军撑门面的部队，它最早装备了“虎”式坦克。然后，为了纳粹党的面子和空军的荣耀，这支隶属于伞兵、但却从未跳过伞，只能开坦克的部队被投入到已经必输无疑的北非战场（1943 年初，突尼斯），并在那里被盟军吊打围歼。

由于大量的兵员和装备被纳粹党优先装备给自己的嫡系部队（党卫军，空军），导致作为战争主力的一百多个国防军步兵师一直处在兵源不足的状态。一个步兵师在 1939 年编有 9 个徒步步兵营（一个营 1000 人左右），一个摩托化侦察营，一个炮兵团以及各类师直属单位，满员状态约有 17000 人，实力充沛，可以进行各种任务。其中，师属侦察营是步兵师唯一的摩托化战斗单位（比只能靠脚板走路的步兵营快很多），装备有摩托车和装甲

车等。在进攻作战时是主要的突击力量，在防御作战时是重要的机动预备队，同时也是全师的“眼睛”。1942年后，因为工业动员步骤缓慢，装备优先给了嫡系部队，侦察营被取消。同时，由于大量人力没能补充到一线作战部队，以及嫡系部队争抢兵源，每个步兵师被迫在1944年裁掉三个步兵营，并且把原有的摩托化侦察营换成了一个普通的步兵营。这样，全师只有七个徒步步兵营，总共12000人，由于裁掉的都是战斗兵员，导致步兵师持续战斗能力极差，往往只能执行静态防御任务。这样的步兵师，没有侦察营作为前导，进攻乏力，没有机动预备队，防守困难，没有专业侦察部队，成了聋子瞎子。曾经是德军骄傲的步兵，到了战争后期成了打也不能打，跑也跑不掉的累赘。

其实，纳粹党，或者说法西斯政权才是军队战斗力真正的累赘。由于歧视性的物资分配，导致国防军一般步兵部队战力贫弱，士气低落，无法与党卫军和装甲部队有效协同，致使许多战役功亏一篑。由于需要大量党卫军监视国防军，导致后期党卫军数量病态膨胀，许多没有经过训练的外国伪军和集中营官僚纷纷加入，但是国防军久经战阵的部队却得不到武器。自720事件（由国防军军官组织的刺杀希特勒事件）发生后，纳粹党愈发不信任国防军，在国防军内安插眼线，干预指挥。为了进一步孤立国防军，纳粹党宣传部门居然也组织了自己的武装（人民冲锋队），进一步挤压了原本已经捉襟见肘的人力资源。

所以，我们得出了第三个结论：**法西斯国家机器绝非铁板一块，任何资产阶级政权可能会出现内部派系纷争都会出现在法西斯政权中，有时还会更激烈。这进一步限制了法西斯政权的国家能力。**

法西斯国家逃不过阶级分析



从上面三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法西斯国家机器：1、有很多不敢做的事；2、敢做的事也不一定能做成；3、派系内耗严重。这一切都颠覆了很多人眼中法西斯国家无所不能的形象，而且，就算是法西斯国家的祖师爷级的代表纳粹德国也无法逃脱这些限制。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认为：国家是维持阶级统治的工具，法西斯国家是资产阶级统治的一种特殊形式。所有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都会存在于法西斯政权下。资本主义面对的资本积累危机（如何为资本家维持利润率），阶级冲突（如何为工人群众提供一定的生活条件且不过分伤害利润率），以及债务危机，金融危机，环境危机和世界体系危机等如果不能在法西斯政权的框架内解决，那么要么法西斯政权会被抛弃，要么资本主义本身会被抛弃。

法西斯政权确实可以通过镇压的手段来压制人民的反抗，但是镇压本身是有限度的。当法西斯政权对人民的压榨（如战争动员，私有化，去管制和打击工会等）越强时，它就把自

已摆到了占人口比例越大的民众的对立面。为了镇压这些民众的反抗，它势必会组织越来越多的军警力量，建立越来越庞大的行政机关来履行越来越复杂艰巨的镇压任务。但是，他所能动员的人数受到其群众基础的限制，当他不得不在利益受损的普通群众中大量征召基层军警时，国家机器本身的效率和忠诚度就会打折扣。所以，《1984》里出现的动员整个专政机关去镇压一个心不在焉的公务员的情况，在现实的法西斯国家中，是既不划算，也不现实的。而纳粹德国把大量的人员塞进后备军这种典型的总政才是常态。从表一反映的状况看，纳粹党唯一的死心塌地的支持者就是自己的官僚人员，他们在战争中被大量补充进党卫军。而纳粹党官僚加上党卫军（算上外籍志愿者）最多不过战前总人口的1.3%-1.5%。而在春醒行动中（1945年春）临时征召的党卫军也出现了严重的厌战情绪，出现了大量的抗命不尊的情况，以至于希特勒在盛怒之下剥夺了“希特勒青年团装甲师”的荣誉臂章。

另一方面，给劳动人民发枪发警棍让他们镇压自己，对法西斯统治者也是十分危险的。随着大量的工人群众接受军事训练，且拥有武器时，统治阶级的地位也会受到威胁。对于坐着称霸欧洲大梦的沙皇尼古拉二世来说，昨天还温顺恭敬的“灰色牲口”（资产阶级对沙俄士兵的蔑称，因起制服颜色为灰色而得名），今天就成立了“工人与士兵代表苏维埃”（1917年春），明天就发动了十月革命（1917年11月），后天就把沙皇枪毙了。从社会分工和阶级形成的角度来讲，法西斯政权为了镇压人民和对外扩张而设立的大规模常备军简直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大学校。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红军中的许多将领都曾经在旧军队中就职，在旧军队和旧政权中掌握的夺取国家和管理国家的经验本领，成为了他们在革命生涯中不可多得的财富。因此，法西斯政权越猖狂，越是獠牙毕现地镇压民众，它就越依赖民众，越需要民众喂养它庞大的躯体，因而也就越虚弱，越不堪一击。

不是人民怕纳粹，而是纳粹怕人民



从全局看，法西斯国家政权在打击某个个人时是强大的，但是在面对人民时，它又是弱小的。从局部看，法西斯政权少数最有效率的专政机关在针对弱小的个别反抗时当然很强大，但是占绝大多数的消极怠政的基层政权也绝不是有组织的民众的对手，甚至在特定情况下会倒向民众。

任何一个暂时成功（不会永远成功）的法西斯政权，都是建立在解决当时资本主义部分矛盾的基础上。今日上台的右派政府，既对恢复利润率无计可施（压低工资基本不可能，贸易谈判基本失败），又不能哪怕是暂时提高一下民众的生活水平（私有化和去管制势必伤害劳动人民），而且都没有取得本国资本家集团多数以及军方的明确支持，官僚机构本身也对其爱搭不理，在自己党团之内的名声与威望都很堪忧。就这样一个半吊子的政权，是否出现“政令不出白宫/唐宁街”的结果还未可知，让他们去当法西斯真是高看了他们。对

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处在外围和半外围的国家（如印度，巴西，越南），由于自己生产的剩余产品会有相当一部分以不平等交换的形式“进贡”给发达国家，所以能维持的统治阶级人口比例更小，能够有效收买的官僚队伍更小，社会矛盾会更尖锐，镇压任务会更繁巨，因此如果出现法西斯政权，其国家能力也会相当贫弱，也更容易被社会革命所粉碎。

法西斯可怕吗？不仅不可怕，相反，法西斯分子他们自己还害怕得很，法西斯害怕的是联合起来的人民群众。随着世界各国工业化，城镇化和无产阶级化的进行，越来越多的工人，农民，乃至白领小资都能逐渐认清自己的无产阶级身份，并开始主动为无产阶级和人类未来而奋斗。同时，全世界越来越多的进步民众组织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不是人民怕纳粹，而是纳粹怕人民。无产阶级和工农大众会筑起反抗法西斯的高墙，也会举起斩断资本主义的钢刀。

参考文献：

1.德国国防军报告网站：<http://wehrmachtbericht.com/page14.php>

2.恩格斯：《反杜林论》

《闪电战》杂志第五十期：“戈林元帅的掷弹兵——二战德国空军野战师简史”

<http://www.resilience.org/stories/2017-02-16/awaiting-our-own-reichstag-fire/>

3.Wallerstein I. The rise and future demise of the worldcapitalist system: concepts for comparative analysis[J]. Comparative studies insociety and history, 1974, 16(04): 387-415.

法西斯是从脑子里蹦出来的吗？

2017-3-6

原作者：“装甲巡洋舰曙光号”

3月3日，张跃然先生在“政见”公众号发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何解释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一文。该文随即被“现代资本主义研究”转载。

在这篇文章中，张跃然先生提出了这样一个核心观点：意识形态是促成法西斯主义兴起的决定因素，经济利益“不仅不是决定一个阶级政治立场的唯一因素，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连主要因素都不是。”

这种观点认为，法西斯主义上台的原因是：垄断资产阶级需要转变“国家形态”，把“自由放任式”国家扭转为“积极干预式”国家；小资产阶级则出于对垄断资本的“羡慕嫉妒恨”和对无产阶级的恐惧，以及坚持社会“公正”的理念自觉充当自带狗粮的帮凶；无产阶级则是由于“梦想破灭”之后的“感伤主义”，和期望大小资产阶级内斗的看戏心态而放弃了抵抗，任人宰割。其中，法西斯主义主要的意识形态：“本土排外主义，国家权力崇拜，对资产阶级财富积累过多的不满和对经济再分配的渴望”恰好符合了小资产阶级的“公正”观，而且填补了深陷“感伤主义、浪漫主义”泥潭的无产阶级的空虚心灵，于是在大资产阶级的操控下翻身上马，一统江山，造就了“二十世纪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片段之一。”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想就张跃然先生文章中的一些观点表达一下自己的看法。

历史唯物主义与“经济决定论”

张跃然先生既然自称想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法西斯主义的兴起，那么势必会赞同历史唯物主义的国家理论。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讲到：“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是建立一种“秩序”来抑制阶级冲突，使这种压迫合法化、固定化。”那阶级又是如何形成的呢？恩格斯这样说道：“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而张跃然先生自称坚持的历史唯物主义，也是“从下述原理出发”的：“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寻找。”（《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如果我们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关于阶级和国家问题就只能有一条逻辑线：物质生产和分工造就了对立的阶级，统治阶级为维护其攫取剩余产品的能力而建立了用于镇压被统治阶级反抗的国家机构。因此，包括法西斯国家在内的一切国家机器（包括未来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都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当然，当阶级力量势均力敌时（而不是由于某些奇妙的意识形态在某些个人脑中炸裂），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国家权力作为表面上的调停人而暂时得到了对于两个阶级的某种独立性。”（《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当然，这种独立性是现实斗争的产物，并不是意识形态的虚构。

具体地，对于法西斯统治所依赖的资产阶级而言，其“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共产党宣言》）”。所以，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任何可能威胁到 1、私有制；2、资本积累的行为都会遭到资本家的抵抗。

从根本上讲，无论是阶级本身的产生，阶级斗争的成因和结果，都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方式决定的。这些一再被历史证明的东西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理论和

国家理论。如果这些都能被张跃然先生称为“经济决定论”的话，那么任何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都应该骄傲的宣称自己是“经济决定论”者。

张跃然先生自己也承认，在“普兰查斯看来，一个社会的经济形态和生产力水平……创造出了推动历史发展的主体—各个阶级”。按照张跃然先生的看法，那种应当受到批判的“经济决定论”的本质，是“将政治现象简单归因为生产力发展**程度**（粗体是笔者加的）的解释框架。”“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这种“经济决定论”将所有的政治经济现象不加区别，不顾抽象程度地挂靠在某些具体指标上，仿佛只要达到了某个指标，各个社会形态，生产方式的变革就会自然来到，共产主义的天国就会自然到来。这种观点当然是庸俗的，它有一个专门名称叫“线性历史观下的唯 GDP 主义”，它是二十世纪末某些“转型经济体”（资产阶级经济学名词：指那些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演变的前社会主义国家）如越南等国的腐化变质的统治阶级建立自身合法性的借口。张跃然先生批判这种庸俗的“唯 GDP 主义”当然是正确的。

不过，张跃然先生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摒弃了经济基础的作用，试图绕开现实物质利益，而用意识形态解释阶级斗争和法西斯主义的兴起。这就将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了。

意识形态的大饼能喂饱民众吗？

在讲到小资产阶级和工人时，张跃然先生的观点立足于他们在作出历史抉择的时候，出现了“政治和意识形态倾向的统一，而不是经济状况的统一”。简单地说，是小资产阶级由于自身的心理疾病，无产阶级由于前一段时间受到的失败以及坐山观虎斗的心理，**受到了法西斯意识形态的诱骗，做出了明显有违自身利益的选择**。其中，小资产阶级被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继续挤压，无产阶级遭受的剥削也“大大强化”。照此说法，法西斯统治下的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遭受了巨大的苦难。

事实如此吗？

张跃然先生指出了两种“小资产阶级”的来源。一种是掌握部分生产资料，但是不能支配别人劳动的小业主，另一来源是不掌握生产资料，但是可以掌控一部分别人劳动的官僚、职员。但是在文章中张跃然先生并没有仔细分析当时德国小资产阶级的情况。事实上，在法西斯主义兴起的时候，小业主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已经不是具有重大影响力的阶级。真正发挥作用的是以官僚、职员为代表的现代小资产阶级，而他们在纳粹党上台时是得到明显的好处的。

首先，作为给大资本和国家机器打工的官僚和职员，德国经济形势，尤其是经济增长状况对于他们的饭碗和工资都是极其重要的。据历史统计，德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扣除价格因素的实际值，单位为1990年国际元），从1932年的3362国际元上升到1939年的5406国际元（数据来自麦迪逊计划）。其中，德国的人均GDP自1935年起就超过了经济危机前的最高水平，而法国直到1939年，美国直到1940年才恢复到危机前最高水平。迅速发展的国内生产和扩军备战的需要迅速吸纳了被经济危机和凡尔赛条约排挤出去的小资产阶级。以德国国防军规模为例，1933年，国防军只有凡尔赛条约规定下的10万人，到1936年，德军就组建了包括三个装甲师在内的超过50万军队，而到了开战前的1939年，德国武装力量总数已经超过了450万（德国国防军报告网）。过去被迫在外当打手、当保安的职业军官团和以各种名义存在的法西斯民兵组织被大量吸纳进国防军，成为了吃皇粮的正式雇员。像莫德尔、古德里安、隆美尔等在校官乃至尉官位置上窝了十几年的老油条，在三、四年之内以火箭般的速度被提拔成了将军。为了搞基础设施建设和重化军工投资而扩编的官僚和专业技术人员队伍也满足了小资产阶级对于就业稳定性的要求。所以，小资产阶级事实上是从法西斯政权中获利的一部分。

无产阶级的情况呢？宏观上讲，纳粹政权相当清楚魏玛政权的倒台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无法解决就业问题。所以，在其上台之初，就一方面缩减工作日，另一方面实行经济扩张政策。根据《纳粹德国劳动者保护政策研究》，德国工人的工资总额从1933年的113.2亿马克上升到了188.37亿马克，同时失业率从1932年的30.1%下降到1938年的2.1%

（《帕尔格雷福世界历史统计（欧洲卷）》），到 1939 年，德国甚至发生了劳工短缺，以致不得不从工厂里直接征兵。同时德国工业产量指数在 1932 年到 1936 年之间翻了一倍。1932 年到 1938 年，德国工业工人名义工资上涨了约 27%，同期消费物价指数上涨了约 13%，两相加减其实际工资大约上涨了 12%。所以，在法西斯上台后，德国在消灭失业的基础上还为工人提供了更好的生活水准。

微观上讲，从 1932 年到 1938 年，德国的一岁婴儿死亡率从千分之七十九下降到千分之六十。纳粹政权尽管号称自己“要大炮不要黄油”，但是黄油产量却从 1932 年的 42 万吨上升到了 1940 年的 62 万 7 千吨。肉类产量也从 1932 年的 310 万吨上升到 1938 年的接近 370 万吨，这个增长甚至还快于后来联邦德国同等产量时的增长。啤酒产量从 1932 年的 33.5 亿升提升到了 1939 年的 51.3 亿升。由于黄油，肉，啤酒基本不能用做再投资，它们都是直接的消费品，而德国资产阶级的肚皮就那么大，所以我们基本可以判断，平均而言，德国无产阶级在纳粹上台到战争爆发前确实是吃得好了，喝得也好了。

梳理德国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状况，我们并没有发现意识形态与现实利益的乖离，反而是法西斯为了保证自己的执政地位，不得不对工人做出妥协，而正是因为这种妥协有效地（当然只是暂时的）收买了德国小资产阶级和至少是部分的工人，德国才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民众不满。所以，德国工人阶级并不傻：意识形态的说教，SM（萨德马索克主义）的迷狂，国家至上的宣传和雅利安民族的神圣都不能喂饱德国工人阶级，要想暂时收买德国工人，暂时麻痹其斗志，要真金白银，啤酒腊肠才行。

抛开意识形态的迷雾，唯物地看待法西斯的兴起

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并不是因为它的意识形态有什么特殊的魅力。作为资产阶级统治的一种特殊形态，它的出现是为了解决资本积累危机。从资本主义历史整体出发，我们可以看到，1929 年到 1933 年的大危机是资本主义历史的一个标志性时期。随着自由贸易和金本位制度的崩溃，以往自发调节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的国际机制不复存在，各国都开始向

后来的“大政府资本主义”转变。这并不是因为什么大资本要击垮小资本，而是为了挽救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

排除金融投机的表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基本上都表现为利润率和投资恶性循环式的交替下降。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范围越广，程度越深，世界市场联系愈发紧密时，这种恶性循环就越有势如山崩的效果。生产萎缩，投资崩溃，民众失业吃不上饭开始上街闹事，或者争着向当时的苏联移民时，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也就陷入危机。为了挽救整个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代表——国家，就出面试图打断这个恶性循环。要么给资产价格兜底，要么扩大投资，要么干预货币，只要能够走出这个循环，救资本主义于水火，什么偏方都会被病急乱投医的资产阶级使用。法西斯主义的扩大重化军工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一定程度的劳资妥协和收买小资的阶级政策，以及拒缴战争赔款的政策恰好能够缓解德国资本主义当时最紧迫的危机（利润率、阶级冲突）。

所以，法西斯主义上台的原因，不是因为它能忽悠，而是因为它至少部分地，暂时地解决了资本主义危机。当危机没有那么严重时，资产阶级对纳粹党基本上是一副弃之如敝履的态度。这也是为什么 1924-1927 年德国经济状况暂时好转，纳粹党的支持率就开始下降，甚至发生斯特拉塞（北方纳粹党领袖，一度与希特勒分庭抗礼）、鲁登道夫（德国一战将领，纳粹党早期领导人之一）等人领导的分裂运动的原因。而如果有危机却不能解决，不能在资本主义基本制度不变的框架下暂时满足各阶级最紧迫的利益，别说工人阶级，就是经常拿着自己打仗的本事待价而沽的军官团都不会搭理纳粹党。这也是 1944 年 7 月国防军军官团在三名元帅的组织（维茨莱本、克鲁格）和默许（隆美尔）下，利用国防军反政变演习（女武神计划），试图刺杀希特勒的原因。

法西斯不是从脑子里蹦出来的，它是由特定时代、特定国家、特定世界体系的经济基础决定的阶级斗争中产生的。既然法西斯政权不是什么“天上神物”，那它就和其他一切的资产阶级政权一样，是“两个肩膀扛一个脑袋”，也要处理利润率，处理阶级关系，养活占人口比例越来越大的官僚机构（参见“红旗太平洋”上一篇文章：《纳粹德国都那

么怂，你怕个什么法西斯》），也可以被打倒和消灭。战胜法西斯的第一步，就是停止自我恐吓，从思想上对其“祛魅”。惟其如此，法西斯才能成为可以被分析的事物。

战术上重视敌人，战略上藐视敌人

“现代资本主义研究”公众号在转载张跃然的文章时，对“红旗太平洋”上一篇文章关于法西斯的文章做了个简短的评论。他们认为，我们上一篇文章表达了一种“盲目乐观”的态度。他们认为当“工人阶级的组织力量已经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和破坏，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只会比法西斯上台前更难，而不是更容易。”

坦率的说，“现代资本主义研究”的同志并不是特殊地害怕法西斯，而是一般地害怕一切有可能对“工人阶级的组织力量”造成“毁灭性打击”的事物。说白了，就是害怕在阶级斗争中受到损失。我们非常能够理解这些同志爱惜其他同志们生命的想法。但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从来不会因为工人挂上“免战牌”而停止。资产阶级，如往常一样，会主动在工人阶级脆弱的时候发起进攻，这是工人如何害怕都不会避免的。对于工人来讲，抛弃幻想，准备斗争是必须要有的姿态。

那么问题来了，工人阶级为何而战？为了牺牲？为了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个人英雄主义？为了视死如归，冲向黑暗的蛮勇无畏？都不是，工人阶级是为胜利而战。既然是为了胜利，而不是牺牲，那么明确分析敌人的弱点，寻找可能的突破口，积极研究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才是战胜法西斯应有的态度。否则就难以避免在对抗法西斯问题上陷入“速胜论——亡国论”之间无头苍蝇式的摇摆。

历史上，在1927年国民大革命失败时，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但是，只要反动派解决不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矛盾，无论他蒋介石再怎么模仿法西斯，都会有千千万万人站出来继续革命事业。我们相信，当年的中国革命者“杀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的勇气与乐观，绝不会在今天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泯灭。

参考资料:

马克思、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

恩格斯: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列宁: 《国家与革命》

《纳粹德国劳动者保护政策研究》

《帕尔格雷福世界历史统计 (欧洲卷) 》

《第三帝国的兴亡》

《逃避自由》

麦迪逊世界历史统计资料: <http://www.ggdc.net/maddison/maddison-project/home.htm>

德国国防军报告网站: <http://wehrmachtbericht.com/page14.php>

《现代资本主义研究》不乐观，却很盲目

2017-3-8

原作者：“猎潜艇 271 号”

《红旗太平洋》撰稿人“装甲巡洋舰曙光号”与《政见》评论家张跃然之间关于法西斯主义的论战，渐入佳境。讨论的是法西斯主义问题，实际上辩论的是现实斗争。张跃然先生拾普兰查斯之牙慧批什么“经济决定论”，实际上就是否定历史唯物主义，宣扬历史唯心主义。历史证明，这样的历史唯心主义，自从在西方学术左派中泛滥以后（自卢卡奇和法兰克福学派开始），既没有挡住法西斯主义，也没有挡住新自由主义，现在面对资产阶级极右势力的猖獗，眼看又要败下阵来。如此百年一贯的失败记录，不好好总结自身教训，还要“批判”世界其他地方的进步和革命斗争，只能说是缺少了一点自知之明。

不过，张跃然先生毕竟是写了文章的，没有功劳，亦有苦劳，确实凝结了一定的社会（或非必要）劳动时间。倒是《现代资本主义研究》的政资研编辑部，更加懂得投入产出法，转载之余，三言两语，便将“装甲巡洋舰曙光号”推下擂台。“装甲巡洋舰曙光号”认为：“纳粹德国都怂了，你怕个什么法西斯？”；而《现代资本主义研究》却坚定地认为：法西斯可怕！可怕！实在是可怕！

不久前，“红旗太平洋”的同志发文称：法西斯没什么可怕的，其统治难以持续。这又是另一种盲目的乐观——即便法西斯无法持续又如何？工人阶级的组织力量已经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和破坏，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只会比法西斯上台前更难，而不是更容易。

你看，法西斯一上台，即使“无法持续”了，“工人阶级的组织力量已经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和破坏”，毁灭、打击、破坏，这还不可怕吗？这还有救吗？谁不承认法西斯可怕，谁就是“盲目乐观”，这个帽子扣定了，必须戴，不戴也要戴。

笔者认真阅读了“装甲巡洋舰曙光号”的文章，发现那是一篇历史论文。既然是历史论文，那就是关于在世界历史上已经发生的事情，不是想象的事情，因而不可能是盲目的。“装甲巡洋舰曙光号”论证，即使是号称强大、高效、“祖师爷级”的纳粹德国，也是内部矛盾重重，为各种利益集团所牵制，乃至不得不对工人阶级做有限的让步，有数据、有史实、有分析，何来“盲目”？

倒是《现代资本主义研究》的一句“盲目乐观”完全属于无的放矢。无的放矢者，就是看不见目标便乱射箭、乱攻击；看不见者盲目也。《现代资本主义研究》自己不“乐观”，还要反对别人“乐观”，实在是源于自己的“盲目”。

如果说，法西斯主义即使“无法持续”，工人阶级也已经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那么，这种毁灭性的打击，还能有超过纳粹德国的吗？纳粹德国被苏联红军消灭以后，德国工人阶级垮了吗？在东部，在苏联的支持下，德国工人阶级一度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即使在西部，也建立起了巩固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并一度出现了社会改良主义的黄金时代，工人阶级的物质利益和社会经济权利都有了很大的增长。这是历史的进步还是退步呢？是德国工人阶级垮掉了，还是德国工人阶级力量上升并迫使资产阶级让步呢？至于世界范围，更是一度出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发展的大好局面。这不都是在法西斯主义“无法持续”以后发生的吗？世界历史的经验证明，经过了与法西斯主义斗争的磨炼，国际工人运动、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不是被削弱了、被毁灭了，而是更加坚强、更加壮大了，在一个时期内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世界资产阶级也不得不做出很大的让步。

至于说，法西斯一旦上了台，“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只会比法西斯上台前更难，而不是更容易”；不知道这是不是《现代资本主义研究》经过慎重研究以后得出的结论。如果是，那么该公众号的研究水平着实堪忧。我们知道，所谓“法西斯”源于古罗马的一种“权杖”，而“法西斯主义”除了特指在意大利、德国等国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资产阶级独裁政体以外，有时也泛指一般的军事独裁政权。比如，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就曾经在中国实行过法西斯式的独裁统治。

那么好了，中国革命是怎样胜利的呢，是不是打败了蒋介石独裁政权以后胜利的呢？俄国革命是怎样胜利的呢，是不是推翻了尼古拉二世的沙皇专制政权以后胜利的呢？古巴革命是怎样胜利的呢，是不是推翻了巴蒂斯塔独裁政权以后胜利的呢？

这些独裁政权，也可以叫法西斯政权，当它们还存在着的时候，貌似都是很强大的，认为它们实际上不那么强大而且是必然灭亡的人，往往被另外一些人认为是“盲目乐观”的。归根结底，那些指责别人“盲目乐观”的人，只看到了法西斯的力量，只看到了反动派的力量，而没有看到无产阶级的力量，没有看到人民的力量，只看到了眼前一点东西，而没有看到事物的发展变化，因而才把某些局部的、暂时的东西当作了不可更改的、固定不变的东西，把本质上的纸老虎（局部的、眼前的“真老虎”）当成了永远的、打不死的神老虎。实际上，世界上哪里有不死的老虎呢？

凡此种种，都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并且已经为革命、反革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反复证明是错误的，也将为世界人民的革命实践继续证明是错误的。

不是朝鲜怕美帝，而是美帝怕朝鲜

2017-4-17

原作者：“鱼雷快艇海鹰号”

朝鲜半岛的战争紧张局势，在持续紧张加剧之后，随着朝鲜军民于上周六在平壤举行空前盛大的阅兵式而告一段落。

一个回合下来，到底是朝鲜怕了，还是美帝“怂”了？按照中文媒体上占主流地位的亲美舆论，美国武力天下第一，想打谁就打谁，想炸谁就炸谁，想“斩首”金正恩，也不过举手之劳。美国要朝鲜“去核”，朝鲜又失去了周边主要大国支持，连仅有的煤炭出口这一主要贸易手段也被切断，敌军包围万千重，乌云压城城欲摧，朝鲜岂能不怕，岂能不垮？

事实却是，美国三个航母战斗群的武装大游行，极尽耀武扬威之能事，而无一寸用武之地，给汉城方面壮过胆以后，便可以鸣金休息了。

当今之世，其实不是朝鲜怕美帝，而是美帝怕朝鲜。这不是“鱼雷快艇海鹰号”的发明，而是从香港到美国若干“国际问题专家”的意见。

“北韩人心态值得研究”

先来看香港《东方日报》，该报向来持右派反共立场，于本月 16 日发表某大学讲师文章，称“北韩人心态值得研究”，认为金正恩等领导人“不惊不怖”，“谈笑自若”、有“大丈夫气魄”。（http://orientaldaily.on.cc/cnt/news/20170416/00184_010.html）

现将相关段落转抄如下：

朝鲜半岛波谲云诡，硝烟腾腾，这两天我一直注意局势发展，却不期然有点佩服北韩人，包括他们领导人金正恩的冷静程度。是因为他们自我麻痹的工夫做得太好，抑或他们当真有如此大丈夫气魄，可以视死如归，故一切也洋洋如平常？

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派兵整天在朝鲜半岛周边喊杀连天，此君个性有点乖张、暴戾，加上早年毕业于军校，见过战阵，不忌讳动刀动枪，所以一旦动起真格，平壤之内随时尸横遍野，玉石俱焚，可不是闹着玩的。战争掀起时，北韩极可能要遭遇人类历史上最尖端的武器攻击。美国的尖新武备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海湾战争中曾大规模展示过，如今过了二十多年，期间武器的杀伤力已大幅度提升，美军一旦出击，定然是泰山压顶之势。北韩一众领导层的性命，恐怕阎王殿上已要准备「开快劳」作监察了。

所谓物伤其类、同体大悲，这几天笔者一直在设想，如果换我是北韩的领导班子，眼前面对的是一场有败无胜的战争，不知是几天抑或几个月后自己就可能要挫骨扬灰，此时此刻，我也能平静如恒吗？在镜头所见，自金正恩以下一众领导人却像是不惊不怖，有时还谈笑自若，一点也不紧张。说句笑话，若论面容的绷紧程度，我们香港特首选举论坛上的候选人恐怕还远过于金正恩。

朝鲜半岛危机过后，北韩人的心态实在值得社会学家深入研究，他们的倔强表现、面对危机的冷静，是共产主义思想长期「洗脑」的结果，抑或有其他原因？但愿日后专家们有以教我。

在这位香港大学讲师看来，“北韩”领导人的政治素质实在是胜过香港“特首”一筹。但是，朝鲜领导人如何能做到，大敌当前，镇定自若，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大学讲师无解，只能留待社会学“深入研究”、“有以教我”。

好在，还有美国专家，能够做出比“心态”、“洗脑”一类更加理性，更加“大视野”的分析。

第二次朝鲜战争？——世界末日！

各位看官，大家看清，接下来的文字，不是“鱼雷快艇海鹰号”为独裁者金正恩张目，也不是朝鲜人民吓唬美帝，实在是美帝自己吓唬自己。

本月 15 日，丹尼斯·海尔品（Dennis Halpin）先生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上撰文，题为“世界末日：第二次朝鲜战争的毁灭性后果”

（http://www.realclearworld.com/articles/2017/04/15/armageddon_the_devastating_consequences_of_a_second_korean_war_112293.html）。这位海尔品先生是有些来历的，曾任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洲事务顾问，现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美国-朝鲜问题研究所访问学者。

海尔品先生首先提醒美帝国主义上层决策人物，朝鲜曾经沦为日本殖民地四十年，不能排除，朝鲜领导人吸收了日本人“神风突击”的敢死精神。俗话说：穷的怕横的，横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美帝国主义既不穷也不愣（美帝富甲天下，而且如毛主席所说，到了没办法的时候，还是讲一点道理的），遭遇了不要命的朝鲜，不可不慎之又慎。

海尔品先生进一步分析，朝鲜“不是伊拉克”，朝鲜的三万精锐特种部队远非萨达姆的“共和国卫队”可比；一旦战事爆发，朝鲜的特种部队随时可以将南朝鲜闹个天翻地覆。

朝鲜是有核国家，估计有核弹头二十枚。萨达姆的化学武库是假的，朝鲜的可是真的。据估计，朝鲜拥有各式化学武器 2500 吨至 5000 吨，随时可以通过部署于停战线朝方一侧的一万门大炮发射到现有 2500 万居民的汉城城市带。必要时，朝鲜还可以通过导弹对日本发起化学战。

朝鲜现有的近程和中程导弹已经可以打击到日本和美国在关岛的军事基地。预计数年内，朝鲜将拥有远程洲际打击能力，整个美国大陆将处于其威胁之下。不久前叛逃的朝鲜驻英国公使太永浩供称：“不要低估”金正恩，如果金正恩受到威胁的话，他“是可以按下按钮”，“核平”洛杉矶的。

要之要者，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时，东亚并非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中心地区。现在，朝鲜战争一旦打响，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动机就要熄火，跨太平洋的集装箱贸易就要全面瘫痪，沃尔玛的货架将空空如也。

海尔品先生总结说，“朝鲜战争的代价将是巨大的”：

或许会有两百万乃至更多的（南北）朝鲜人死亡；五万多美国人将死去；为了进行一场在亚洲的陆地战争，可能要对美国平民做大规模战争动员；南朝鲜的基础设施（及其“汉江经济奇迹”）将毁于一旦…；美国在太平洋的基地以及南朝鲜和日本的平民可能遭到化学武器攻击；环太平洋地区的股市将崩溃；全球贸易一片混乱…；自广岛和长崎以来，核武器又一次在战场上使用。

海尔品先生以这样的问题结尾：“为了一次外科手术式的打击，而冒这样的风险，值得吗？”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是不言自明的。

特朗普先生的“无敌舰队”

昨日还是三流商人的特朗普先生，今日已经贵为美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可以发号施令，送出几支航母战斗群到朝鲜海面炫耀一番。飘飘然间，特朗普先生夸耀自己的太平洋舰队乃是“Armada”（见 CNN 报道，<http://www.cnn.com/videos/world/2017/04/12/trump-armada-north-korea-fox-news-sje-orig.cnn>）。

这个典故其实用得妙。Armada 者，西班牙“无敌舰队”也；“无敌舰队”者，庞大而无用也。这支号称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于 1588 年在英吉利海峡被英国人民用海上游击战消灭了。或许，特朗普先生确有先见之明，预见到美利坚帝国也将步西班牙“无敌舰队”之后尘，命不久矣？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

美帝国主义看起来是个庞然大物，其实是纸老虎，正在垂死挣扎。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越南人民、老挝人民、柬埔寨人民、巴勒斯坦人民、阿拉伯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怕美帝国主义，而是美帝国主义怕世界各国人民，一有风吹草动，它就惊慌失措。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1970年5月20日，《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即“五二〇声明”）

“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谁违反了这条规律，就必然受到历史的惩罚！

那些不相信这条历史规律的人，那些相信美帝胜过相信各国人民的人，那些看见眼前一点点利益就忘记了天下大义的人，轻者，沦为国际笑柄、为世人所不齿，重者，从此泄露了“黔之驴”的天机，来日如何还能攘外安内？

毛主席告诉我们，要不要害怕法西斯？

2017-4-25 06:40

原作者：“装甲巡洋舰曙光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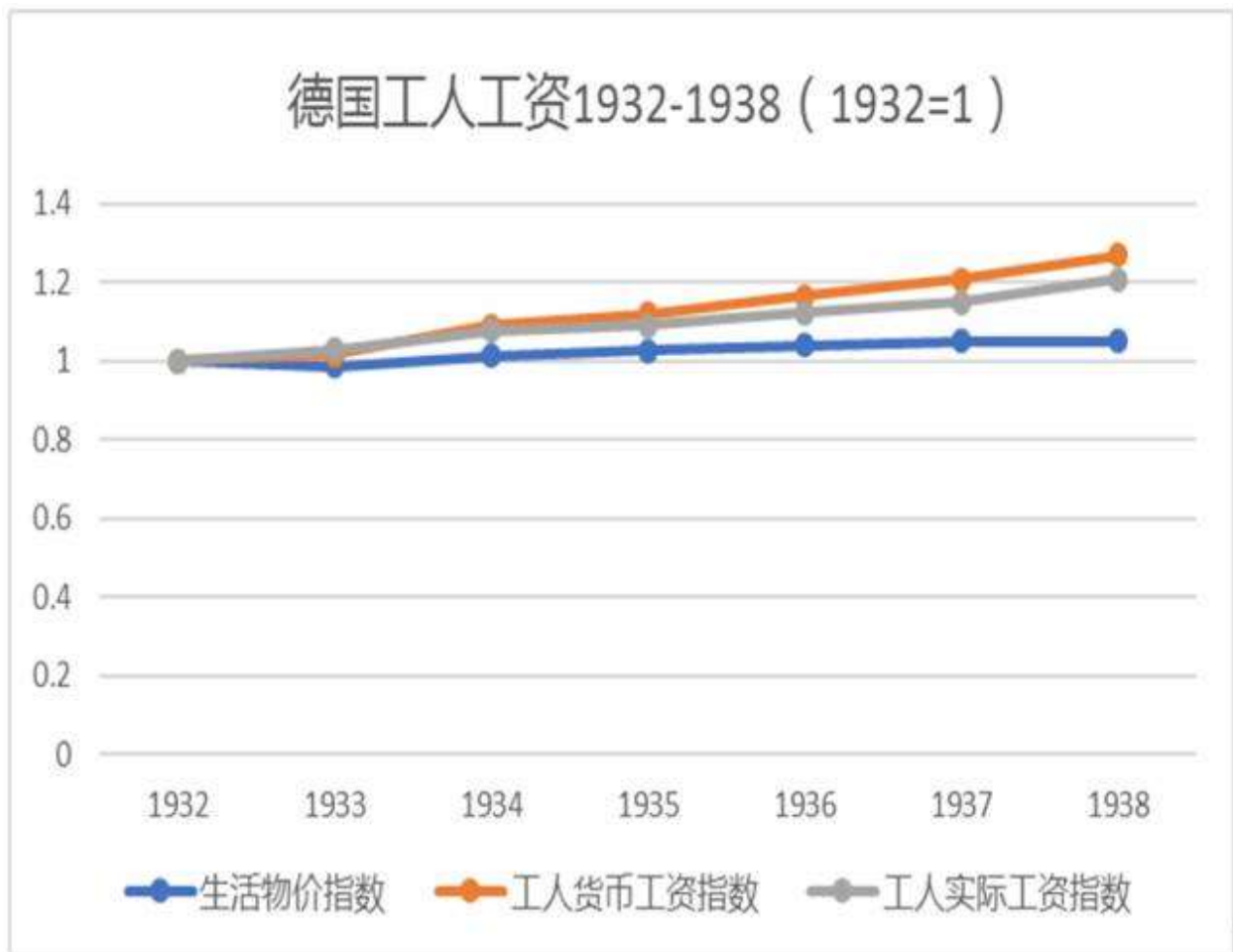
近日收到一位署名“郑梓岩”的同志对“红旗太平洋”发表的《同志，咱们聊聊怎么给资本主义挖坟》一文的评论。在此，我们感谢郑梓岩同志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将就其提出的几个主要问题做进一步探讨。

郑梓岩同志的回复大体可以总结为三个问题：1、德国各阶级的生活水平在纳粹上台直到战前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2、我们对张跃然先生的《马克思主义如何解释法西斯主义兴起》一文是否存在着乱扣帽子的情况；3、法西斯究竟可不可怕？针对其中第一个问题，我们想讨论一下如何看待资产阶级历史统计，以及面对与自己切身经验不符的统计资料时应当怎么入手的问题。针对第二个问题，我们想要讨论对事物的合理归纳和扣帽子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也是让诸多深陷于此的进步人士伤透脑筋的问题。针对第三个问题，我们想谈谈毛泽东同志“大破与大立”的历史辩证法。

一、从资产阶级统计数据看战前德国阶级关系

郑梓岩同志引用了许琳菲等人的论文《希特勒的上台与德国法西斯专政的本质》一文，指出1、工人实际工资降低，；2、所谓减少失业的实质是半军事强制劳动。除此之外，许琳菲等人的论文在同一段中还指出了3、将妇女排挤出就业市场从而人为压低失业率的问题，这与赤旗同志的文章相关，我们在此一并回复。

许琳菲等人指出的工人实际工资降低的原话是“工人的周工资在 1932 年第四季度是 22.6 马克，在 1935 年第二季度是 23.81 马克，或者说工资增长了 6.9%，而同时期食品价格上涨了 13%”可惜的是，许琳菲的文章里并没有指出这些数据是哪里来的，因而我们无法查到原始数据来纠正我们可能的错误（如果我们出错的话）。另一方面，许琳菲等人的数据只反映了 1932 年和 1935 年不同季度的两个时间点的情况，并不能说明纳粹上台直到战前整体实际工资的变化。那么我们如何合理的估算当时德国工人的实际工资呢？根据《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提供的战前德国生活费用物价指数与工人的货币工资指数，我们可以计算出当时德国工人实际工资的变化，图表如下：



图一：德国工人工资状况

图一反映了较为温和的通货膨胀，6年间，生活物价指数上涨了约5.1%，平均每年上涨0.8%。0.8%的年生活物价指数上涨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并没有出现许琳菲论文和郑梓岩同志回复中所描述的剥夺型的通货膨胀，而这个通胀水平要比中国近10年的水平低得多。纳粹党相当清楚正是德国在二十年代初的恶性通货膨胀造就了作为在野党的纳粹第一次大发展时期，到了纳粹党成为执政党时，它当然不希望同样的事情造成民众的严重不满，而再次把自己踢下台。比较实际工资我们可以看见，从1932到1938年间工人实际工资上涨了约21%，并没有出现郑梓岩同志所认为的实际工资下降的情况。

第二，关于所谓“半军事强制劳动”的问题。很不幸的，许琳菲等人又未给出这一论断的出处，也并未在前后给出战前曾存在对整个工人阶级大规模强制劳动的证据。只是在后面提了一句“是对工人阶级实行加紧控制和向军事经济过度的措施。”我们知道，军事工业生产的扩张并不意味着对工人进行“半军事化强制劳动”，因为劳动的性质主要由所有制和分工结构而不是行业决定。战前德国有没有强制劳动？有，在集中营里，这个我们上一篇文章已经论述过。但是集中营的极少量强制劳动（对整个经济而言）与整个阶级的强制劳动显然不是一回事。所以，就连郑梓岩同志自己也说许琳菲等人的论断“感觉说的太绝对”。简单地说，强制劳动属于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手段，这意味着在提高劳动时间的情况下，降低小时工资，以达到增加剥削率的效果。但是，根据《德国的工资》提供的历史资料计算，德国工人1932年到1938年间小时名义工资率上涨约8%，扣除上文计算的5.1%的生活物价指数，小时实际工资上涨约2.8%。从上涨的小时实际工资来看，战前纳粹德国恐怕并不存在整个国民经济意义上的大规模强制劳动。

第三是关于妇女与就业市场的。赤旗同志和许琳菲等人都提出了纳粹德国有计划的排挤妇女就业来为男性创造岗位，让女性重归家庭。不过纳粹党的政策是一回事，实际的状况又是另一回事。根据《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相关数据计算，在1933年到1939年间，德国男性经济活动人口增长约4.8%（武装部队服役人口也计算在内），女性经济活动人口增长了约11.2%，女性占经济活动人口的比例反而增加了。这也反映了法西斯政权尽管在意识形态上打压女性，想要把她们赶回家庭，但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规律和女性解

放的斗争面前，纳粹也不得不接受女性走出家门，参加工作的现实。综上所述，工人阶级是得到好处的。

然后是关于小资产阶级的问题，我们分成两部分说。首先是现代小资产阶级，即以职员和官吏等为代表的，能够支配一定量的社会劳动且不占有生产资料的阶级。郑梓岩同志引用普兰查斯的书认为，战前德国现代小资的工资下降了 20%。然而，正是这样一个重要论断，普兰查斯却没有在后面注明出处，只是一个数据摆在那里。但我们的研究却不能止步于无言，我们必须寻找可靠的历史资料去说明现代小资的状况。普兰查斯在同一页上给出了现代小资两个部分占人口的比例（这倒是给出了较为可靠的出处）。根据普兰查斯引述的数据，白领工人和公务员（这两者是现代小资的绝对主力）在 1933 年占总人口的 18.4%，在 1939 年占总人口的 20.4%。按照这两年的德国人口普查资料，这意味着 1933 年德国拥有现代小资约 1215 万人，1939 年则为 1417 万人。根据《德国的工资》一书第 123 页引述的《经济与统计》上的资料，现代小资的名义薪金总额从 1933 年到 1939 年 136 亿马克上涨到 209 亿马克。根据物价指数扣除价格因素（约 9%），1933 到 1939 年德国现代小资实际薪金上涨约 12%。当然，我们不知道已经逝世的普兰查斯如何处理他的数据，因而难以探讨他具体得出“下降 20%”这一结论的具体过程，但是，现有证据很可能与其结论相左。所以，现代小资产阶级是得到好处的。

再是关于传统小资，即占有一定生产资料并自己参加劳动的小业主阶级。根据《德国的工资》一书，小业主收入 1933 年到 1939 年从 103 亿马克增加到 258 亿马克。而关于小业主的人数，普兰查斯没有给出明确的数字，但是他明确提到了（这也被郑梓岩同志引述的几篇中文文献所证实）：小业主作为一个阶级的数量在减少。那么，我们就假设小业主阶级的数量不变，那么小业主阶层的扣除价格因素的实际收入则上涨了 130%。即，如果要让小业主实际收入下降，小业主的数量在 1933 年到 1939 年间至少要增加 130%才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传统小资产阶级是得到好处的。

那资本家呢？根据迈拓（Maito）的文章，纳粹德国的利润率从1930-34年的5.4%上升到了1935-39年的13.5%。无独有偶，根据《纳粹政治经济学》中的一张图表，我们也能看到资本回报率的上升。



Figure 6. Rate of return on capital in German industry, 1925-1941

所以，资产阶级也是得到好处的。

综上所述，战前德国工人、小资产阶级的实际工资、薪金、业主收入是上升的，资产阶级获得的利润率也是上升的，社会三大主要阶级在纳粹上台到战前都得到了好处。这是为什么呢？按照凯恩斯主义国民分配理论的解释，能够维持实际工资和利润率同时上涨的情况，是以产出资本率的提高，即整个经济效率的提高为条件的。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解

释，是由于闲置的劳动力和闲置的资本再次结合，出现了资本生产率大幅度上涨。用简单的分蛋糕的比喻，就是蛋糕做的大了，资本家和工人和小资分的都比以前多了，在这个意义上，实现了“共赢”。当然，正如“鱼雷快艇海鹰号”所讲的，这种“共赢”是不可持续的，我们在此不再赘述。

按照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的社会形态更替理论，纳粹党之所以能够上台和保住政权，是因为它至少暂时地解决了当时德国资本主义最突出的矛盾，即积累危机和阶级冲突。从根本上讲，正是因为战前纳粹党执政期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框架的调整释放了原先被束缚的生产力，因而暂时地挽救了资本主义。

另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关于劳动收入份额的问题。劳动收入份额是我们前一篇文章论述利润挤压理论的重要概念，指的是劳动收入份额占国民收入分配的比重，从长期来讲，是阶级斗争实力对比的晴雨表。郑梓岩同志引述向洋的硕士论文，指出纳粹德国战前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关于这个问题，根据不同的统计资料计算的数字是不一样的（鱼雷快艇海鹰号也探讨了这一问题）。但是从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一般趋势来讲，在二战以前，危机最深重的时期往往是劳动收入份额最高的时期，相对的，即利润份额最低的时期。这是因为利润对整体经济形势的反应更加灵敏，而劳动收入的反应则相对迟缓。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这叫“劳动市场缺乏弹性”；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来说，这叫“工资粘性”；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这是工人和部分现代小资进行反失业、反减薪斗争的成果。战前德国利润份额的增长和劳动收入份额的下跌，是经济复苏后利润恢复性增长的结果。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实行罗斯福新政，大搞社会保险，建设以“劳资妥协”为旗号的“大政府资本主义”的美国。这并不能说明德国工人阶级生活水平下降。从长期看，第三帝国时期（1932-1938年）的平均劳动收入份额（以薪金和工资总额计算，约为57%，根据Jostock的测算结果），就比第二帝国时期（1895-1913年）高很多（约43%）。所以，从国民收入分配看，纳粹党执政的和平时期，并没有出现工人阶级经济斗争大规模溃败的状况。

当然，我们绝对不能否认第三帝国是资产阶级政权，任何否认这一事实的行为都是为法西斯主义张目。但是，光从情绪上反对法西斯，将法西斯上台和一定时期内保住政权都说成

是“欺骗”，显然是忽视了法西斯本质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形式，将法西斯当成了不可分析的东西。具体的讲，我们也不能否认即使在如此艰难局面下，德国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斗争仍然取得了实际工资、薪金、小业主收入上涨的成果，而且，德国劳动收入份额上涨的长期趋势，也并没有因为纳粹党上台而被打断。这是德国工人阶级在困境中英勇斗争的成果，是不可能用工人阶级因为“感伤主义”、“浪漫主义”而受到法西斯的诱骗一笔勾销的。

以上就是我们对郑梓岩同志关于战前德国各阶级状况的回复，同时感谢“鱼雷快艇海鹰号”同志提供的重要数据资料。郑梓岩同志相当认真地寻找证据支持自己的结论，这一点是令人钦佩的。在此，我想多谈一些关于进步人士如何看待资产阶级历史统计的问题，这个讨论并非针对郑梓岩同志提出的问题，而是针对许多进步人士在从事进步工作中遇到的困惑。

我们不能简单地否认资产阶级历史统计的客观性，因为资产阶级历史统计往往担负着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决策提供依据的职能。它可以为资产阶级服务，也可以为进步事业服务，马克思和列宁都是辩证地使用资产阶级统计资料的大家。我们不能因为资产阶级统计数据本身复杂繁多，又都挂着许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和统计学的术语，就一概地把它们都称为资产阶级糊弄民众的把戏。其实，资产阶级并不总是愚蠢的，在重重意识形态掩盖下的某些实际指标的变动，反映了资产阶级对自己社会矛盾的认识，其中某些认识也是部分符合客观现实的。例如，去年一些自由派经济学家就提出两个很有意思的观点，一个是中国近年来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很低，还有继续下跌的趋势，另一个是劳动生产率赶不上实际工资的增长。因此他们提出要反思、修改，乃至废除《劳动合同法》。

我们必须谴责资产阶级“狗头军师”们想要打击工人的险恶用心，不过我们更应该深入研究他们的表述反映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实际问题。首先，简单地说，全要素生产率是新古典经济学用于解释一切不是由劳动和资本投入引起的经济增长，其中包括但不限于技术进步、组织、世界市场波动和阶级斗争等。如果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为正，就意味着劳资两大阶级按照自己的边际生产率分配过收入之后还有富余，这一富余给工人就是实际工资上

涨，给资本家就是利润率上涨。红色中国网的远航一号同志曾形象地把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看作是劳资妥协的空间，当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高时，劳资妥协的空间就大，资本主义积累秩序就可能相对平稳。反之，当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很低甚至为负的时候，劳资妥协的空间就被急剧压缩，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发生的概率和烈度就会上升。从东亚的现状看，根据统计局的资料计算，新世纪以来实际工资一直在上升而2008年以后的利润率开始急剧下降。这说明近几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带来的劳资妥协的少许富余很可能大部分给了工人，这也是为什么这几个“狗头军师”们呜呼哀哉的原因。而关于实际工资和劳动生产率的问题，用分蛋糕的简单比喻，就是工人分得的蛋糕的增长速度超过了整个蛋糕的增长速度，所以工人分得的蛋糕比例越来越大，资本家分得的蛋糕比例越来越小。这也被我们上一边文章举出的工资份额的趋势所证实。所以，这几个狗头军师的表述并非仅仅是资产阶级的嚣张喊话，根本上讲，这是阶级斗争中已现颓势的资产阶级策划的一场舆论反攻而已。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个体经验与统计数据之间的差别问题，“鱼雷快艇海鹰号”同志已经在《逛店发现，马克思又错了？》一文中进行了深入探讨，我们就不在此赘述。当然，我们也不能盲目相信资产阶级统计数据，更不能在搞不清数据意义的情况下胡乱使用。有兴趣的进步人士应该了解资产阶级经济学和统计学，识破伪科学部分，并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解其中能够反映现实的成分，从而使资产阶级统计数据为我所用。

二、 归纳总结与扣帽子——进步人士如何正确对待讨论中的分歧

郑梓岩同志在回复中认为我们“没有根据”地给张跃然先生“扣帽子”。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许多进步人士在论战时经常遇到这样的状况。一般地讲，我们在参与任何讨论时都需要对自己或对方的观点做一个基本的归纳，对部分特别重要的部分往往需要给出定性，这是我们总结上一阶段讨论成果，开启更深入讨论的必由之路，这无可厚非。例如郑梓岩同志自己就认为曙光号“唯我独革”。即使这样，我们也不能简单地认为郑梓岩同志在扣曙光号

的帽子，因为“唯我独革”很可能是郑梓岩同志根据自己的理论学习和经验总结对曙光号某些行为的归纳。

那么我们究竟有没有给张跃然先生扣帽子呢？这要分成两个问题回答。

第一个问题，我们说的“新自由主义的学术官话”和“政客技术学”是在指张跃然先生个人吗？我们在提到上述两个词的时候，指的都是张跃然先生的文章，而非个人。我们也没有将郑梓岩同志负责的“现代资本主义研究”当成新自由主义的旗手。我们从未在没有经过认真调查研究的情况下给张跃然本人下过什么结论，从未抽象地说过张跃然本人是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但是他在文章中却不加批判地使用了新自由主义的学术官话。

第二个问题，张跃然的文章是怎么使用“新自由主义的学术官话”和“政客技术学”的？我们知道，一篇文章究竟讲了什么，并不取决于它宣称自己在讲什么，而是取决于其在论述展开过程中的立场和方法。

张跃然的文章《马克思主义如何解释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宣讲的是这样一种观点，所谓“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对法西斯主义的解释“基本上都是【经济决定论】或【生产力决定论】”，这些解释“将政治现象简单归因为生产力发展程度的解释框架”，这种理论“机械而缺乏美感”，且“与基本史实相悖”。因此，他引述普兰查斯的书，想要找到一种“即能守护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又能去除掉其（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笔者注）经济决定论色彩”的理论。

那么张跃然是如何克服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的“缺乏美感”的“经济决定论”的呢？他选择了“将【政治】带回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当中”。那如何回归“政治”呢？按照张跃然的说法，就要承认“经济利益不仅不是决定一个阶级政治立场的唯一因素，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连主要因素都不是”。就要承认“阶级斗争的过程虽然被经济结构所影响，但本质上有其独立的政治逻辑”。就要承认“政治和意识形态倾向的统一、而不是和经济状况的统一，才是小资产阶级作为一股独立政治力量的存在基础”。

且不说“政治”是否曾远离过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需要劳烦张跃然先生号召大家带回来。如果我们要以张跃然为榜样，做一个不那么“缺乏美感”的马克思主义者，克服掉令人不舒服的“经济决定论色彩”，就要坚持“阶级斗争”“本质”上是“独立”的；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力量不是由其经济关系，而是由其“意识形态倾向”所指挥的；所以经济结构在阶级政治中“某些情况下连主要因素都不是”。

如果我们按照这个要求去做，会发生什么呢？张跃然先生很有实践精神地替我们试了试水。按此要求，张跃然指出，法西斯主义上台的原因是：垄断资产阶级需要转变“国家形态”，把“自由放任式”国家扭转为“积极干预式”国家；小资产阶级则出于对垄断资本的“羡慕嫉妒恨”和对无产阶级的恐惧，以及坚持社会“公正”的理念自觉充当自带狗粮的帮凶；无产阶级则是由于“梦想破灭”之后的“感伤主义”，和期望大小资产阶级内斗的看戏心态而放弃了抵抗，任人宰割。其中，法西斯主义主要的意识形态：“本土排外主义，国家权力崇拜，对资产阶级财富积累过多的不满和对经济再分配的渴望”恰好符合了小资产阶级的“公正”观，而且填补了深陷“感伤主义、浪漫主义”泥潭的无产阶级的空虚心灵，于是在大资产阶级的操控下翻身上马，一统江山，造就了“二十世纪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片段之一。”（本段引自我们的第二篇关于法西斯的文章《法西斯是从脑子里蹦出来的吗？》）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垄断资产阶级想要转变国家形态实现彻底的资产阶级专政，让“国家的主导权逐渐从议会向国家官僚机器转移”，那么他们为什么不联合“中等资产阶级”（他们是官僚机器的主要阶级来源，在坚持私有制问题上也是垄断资产阶级的天然盟友），打压无产阶级，而是要“攻克”“中等资产阶级的政治抵抗呢”？如果小资产阶级既对垄断资本家“羡慕嫉妒恨”，又渴望社会“公正”，那他们为什么不联合无产阶级向垄断资产阶级发动进攻，去争取喝汤吃肉，满足他们的“公正”呢？如果无产阶级因为革命失败而成了“浪漫主义”的俘虏，那他们为什么很不“浪漫”地去搞阶级合作去搞议会斗争（议会斗争可是出了名的繁琐无趣，一点也不“浪漫”），而不是“浪漫”地去跟纳粹党争抢街头政治的地盘呢？

如果我们成为了具有“美感”的马克思主义者，“拒斥生产力决定论”，让“经济结构”回归它“连主要因素都不是”的地位，那么我们会发现，这种理论一切皆有可能，什么都能解释。换句话说，就是什么都不能解释。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如何看待经济结构在阶级斗争中的地位的呢？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这样指出：“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任何放弃了“经济结构”作为决定性因素的阶级理论，就同时放弃了对历史的规律性的解释，放弃了人的认识是可以与客观实际相符合的唯物主义认识论，放弃了人们可以在正确认识规律的情况下用符合规律的实践改造世界、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可能性。在“拒斥”了“经济决定论”的、具有“美感”的阶级理论看来，只要法西斯主义给工人“充分嫁接上了这些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元素”，就能把沉湎于“浪漫主义”的工人争取过来，从而取得和长期保有政权，同时工人和小资也会高高兴兴得磕着廉价的精神鸦片而乐于去干这种被卖了还替人数钱的事情。反之，社会主义政党只要不“眼睁睁地看着法西斯政党的崛起”，不去搞什么“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伎俩，就能避免自己被“一纸禁令解散”的倒霉事（关于社会主义政党在当时可能的历史选择空间，参见“鱼雷快艇海鹰号”的最新文章）。我们从来没有否认意识形态战场在阶级斗争中的作用，但是在张跃然提供的意识形态斗争的这些锦囊妙计中，我们没有看到不以人的意识形态为转移的德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矛盾如何决定了意识形态战场的深度广度，如何决定了意识形态斗争的手段与方式。阶级斗争被理解为了意识形态战场上宣传与反宣传、欺骗与反欺骗的扳手腕，而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现实矛盾的结果。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这是资产阶级议会政治中拉拢选民的“政客技术学”。

最早一批将马克思主义冠以种种“决定论”帽子（这确实是扣帽子）的，是新自由主义历史理论的先驱波普尔。波普尔的《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和《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两部书中这样指责马克思主义，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规律性的承认和探讨，以及从经济基础分析规律性的历史唯物主义都是为了“极权主义”张目。简单地说，波普尔看来，马克思主义对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规律的探索是对归属感的需求（波普尔倒

是意识形态独立性的真诚粉丝)，这种归属感会导致对国家、民族和领袖等的盲目崇拜，因为国家、民族、领袖等只不过是归宿的具象化。所以，波普尔看来，打从娘胎里就带着极权主义胎记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开放社会的敌人”。

自那以后，各种说马克思主义是“历史决定论”，“经济决定论”，“生产力决定论”的声音就成了新自由主义话语体系的一部分，这也糊弄了一部分自称“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每当要攻击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论点时，自由派就会从口袋里掏出一顶“决定论”的帽子扣在马克思主义头上，就觉得自己仿佛打倒了马克思主义。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新自由主义理论界基本还停留在“甘愿做三百年殖民地”的“气功大师”阶段，阿猫阿狗都可以冒充理论家的时期非常普遍。而在新自由主义在中国学术界攻城略地的本世纪初，一些不了解中国和世界革命史，也不理解唯物辩证法的进步青年把所谓“决定论”信以为真，简单地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失败，以及自由派宣传的中国社会主义的“僵化”同“一根筋”的，“决定论”的历史唯物主义等同了起来，这不足为怪。这一倾向的另一种表现是抬高马克思青年时期的著作，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而贬低、割裂马克思本人思想成熟时期的作品，尤其是割裂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的联系。曙光号自己在大学时期也犯过这样的错误，曾认为马克思晚年（指1867年以后）背叛了自己青年时代蓬勃燃烧着的“历史人本主义”思想，忽视了意识形态，哲学批判和宗教批判的“独立性”，封闭了历史走向其他道路的可能，成了“经济决定论”和“线性历史观”的代表，走上了黑格爾的老路，而恩格斯则被当时的曙光号认作是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罪魁祸首。后来，在学习实践和与自由派论战的过程中，越来越深入地学习了唯物辩证法，认识到了自己由于不了解历史和思想史而被“新自由主义的学术官话”蛊惑，犯了唯心主义的错误。在张跃然的文章里，我们并没有看到他有意识地批判和甄别“经济决定论”，而几乎是对新自由主义攻击“决定论”的官话照单全收，当需要阐述历史规律时，只是模糊地承认一下“社会经济形态”等物质因素“当然是重要的”，但是到具体问题，就又变成了“羡慕嫉妒恨”，“公正”，“浪漫主义”。这不是对唯物史观的任何“发展”，只是对其进行一番抽象的肯定和具体的否定而已。至于郑梓岩同志认为我们要和张跃然先生争个输赢，这显然完全误解了我们发文讨论的意义。正是

曙光号自己也犯过错误的经历让曙光号对其他人犯有同样的错误更为敏感，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我们有义务让其他同志少走些弯路，不再犯同样的错误。

所以，“就事论事”地讲，我们说张跃然的文章里面不加批判地使用新自由主义的学术官话，将阶级斗争的规律阐述成了“政客技术学”，是对文章中具体问题的正确归纳，不是给张跃然本人，更没有给“现代资本主义研究”的同志“扣帽子”。

在进步人士的日常讨论中，我们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为了避免误会，我们不能随便给别人扣帽子，也不要随便说别人给自己扣了帽子。而应当具体分析和总结自己与对方的立场、方法与结论，虚心接受正确的批评，分析和指出不当的批评。在中国革命史上，曾经的中国共产党毫不讳言自己的同志，甚至是自己的中央委员会曾经犯过的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实事求是、健康坦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曾经的中国共产党保持自己优良作风的法宝。这也是我们应当向中国革命史学习的。

三、 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大破与大立的历史辩证法

郑梓岩同志认为我们在对待法西斯的问题上“盲目乐观”，而且具体地给出了是如何“盲目乐观”的，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应该赞赏。郑梓岩同志认为我们的“盲目乐观”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第一，法西斯的行为是不可以用常理分析的，它“发起疯来，倒退回前现代都有可能”；第二，法西斯可怕，是因为它会拖长革命进程的时间，增加牺牲，“谁不愿意革命的牺牲更小呢？”，因而郑梓岩同志怕的是“人类再次受到巨大的伤害”。我们下面就来一一回答郑梓岩同志的问题。

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正如我们前面论述的，法西斯主义是资本主义为解决自身矛盾而设计的，当它无法解决矛盾时，无论是这种统治形式还是其代表集团都会被资产阶级抛弃。法西斯集团的个别人物可能发疯，但是法西斯的经济基础不会发疯。希特勒在战争末期确实发疯似地下达了毁灭德国一切现代工业和交通的命令，但是这一命令一出来就遭到了上

至军备部长施佩尔，下至基层官兵的积极和消极抵抗，从未被认真实施。德国资产阶级没发疯，战后直接把法西斯的元帅、将军、部长和总督们扔给了纽伦堡法庭，自己继续跟从前的敌人做着生意。日本军国主义政府确实也发疯似的叫嚣着要搞“一亿玉碎”，牺牲全体国民。但是冲绳一丢，关东军一完蛋，两颗原子弹一落下来，中国战场敌后大反攻一打响，照样乖乖地把天皇请出来“玉音放送”投降声明。意大利法西斯连发疯都没来得及就被本国资产阶级一窝端了。而遭到战争破坏的世界各国经济也基本于1950年左右恢复到了战前最高水平。部分法西斯狂热分子确实可能发疯，但是我们必须明白，法西斯是资产阶级的一门生意，对待发疯的生意人，有时无产阶级还没来得及动手，资产阶级自己就已经把他们淘汰。当然我们不能指望资产阶级替我们完成革命，但是我们必须明白，法西斯越是发疯，就越是不能适应资本积累的需要，法西斯国家资产阶级营垒内部的纷争和内耗就越激烈，就越容易从内部和外部摧毁。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人类再次受到巨大伤害”所以法西斯可怕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先听听毛泽东同志是怎么说的。在《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1957年11月8日）中，毛泽东同志讲：

“现在还要估计一种情况，就是想发动战争的疯子，他们可能把原子弹、氢弹到处摔。他们摔，我们也摔，这就打得一塌糊涂，这就要损失人。问题要放在最坏的基点上来考虑。我们党的政治局开过几次会，讲过这个问题。现在要打，中国只有手榴弹，没有原子弹，但是苏联有。要设想一下，如果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二十七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不是我们要打，是他们要打，一打就要摔原子弹、氢弹。我和一位外国政治家辩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打原子战争，人会死绝的。我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一定还要多。我们中国还没有建设好，我们希望和平。但是如果帝国主义硬要打仗，我们也只好横下一条心，打了仗再建设，每天怕战争，战争来了你有什么办法呢？”

这是毛泽东同志结合自己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多年的革命经验做出的总结。在中国革命史上，革命党多少次遭到敌人背信弃义的攻击和屠杀，他们害怕了吗？中国共产党是否因为害怕国民大革命失败，增加牺牲，给人民群众造成伤害，就停止武装反抗？是否因为害怕会背上破坏双十协定的罪名，增加牺牲，给人民群众造成伤害，就不去消灭进犯上党地区和诸条铁路线的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害怕战争，战争就不来了？害怕牺牲，就不会有牺牲？害怕法西斯，法西斯就会对我们温柔一些？

对法西斯，对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对战争的害怕，不是我们推动历史进步，推动人类解放的旗帜，反而是害怕斗争，消解斗志的降幡。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等向帝国主义妥协投降政策，不就建立在对核战争爆发后所谓“人类文明毁灭”的深深恐惧之上吗？那么，赫鲁晓夫这种“害怕”，对于苏联领导下的那一部分社会主义运动起到了什么作用呢？赫鲁晓夫是把社会主义“害怕”大了，还是“害怕”强了？是把干预古巴的美国舰队“害怕”地屁滚尿流了？“戴维营精神”是把“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害怕”强了还是“害怕”弱了？一讲到法西斯，一讲到战争，一讲到和反革命刺刀见红，一讲到可能要在艰苦险恶的环境下继续做进步工作，一些人就害怕了。他们所害怕的，恐怕不是什么同志们的牺牲和人类文明的毁灭，而只不过是害怕打碎自己小资生活的坛坛罐罐，害怕在斗争中接受工农群众的再教育，害怕经历历史和人民的考验罢了。我们相信，郑梓岩同志并不是这样的人。

资本主义发展客观规律告诉我们，法西斯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一种统治方式，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规律对法西斯同样适用，同理，资本主义灭亡的规律法西斯也是逃不掉的。毛泽东同志在一封书信中提到，人类历史的规律，是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如果在不久的将来，东方资本主义统治秩序崩溃，资产阶级的“天下”真的“大乱”了，法西斯或效仿法西斯的政权以各种名目上台执政，他们也无法解决资本主义的矛盾，无法像纳粹德国那样撑起一个哪怕是短暂的“共赢”局面（参见本文第一部分关于“全要素生产率”与阶级妥协空间的探讨）。他们花言巧语的欺骗，无法喂饱民族沙文主义的胃口，无法将无产阶级绑在自己的战车上。而逐渐认识到无论资本主义如何巧立名目都无法解决矛盾的人民大众，会认识到资本主义正是矛盾本身。这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自为的”、以推翻资本主义为目标

的阶级斗争，打垮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打垮资产阶级的直接暴力，打垮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打垮资本主义的社会分工，为社会主义和未来共产主义创造条件。

恩格斯在解读黑格尔哲学时指出：“现实性在其展开过程中表明为必然性”。意思是说合乎客观规律的事物必然会克服重重阻碍成为现实。毛泽东同志和中国革命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只要充分认识和掌握客观规律，那么小的可以战胜大的，弱的可以战胜强的。资产阶级统治秩序的“大乱”，正是未来社会主义社会通往“大治”要走过的中间站。这就是社会变革运动中大破与大立的历史辩证法。

主要参考文献：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恩格斯：《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1957年11月8日）

《帕尔格雷福世界历史统计（欧洲卷）》

纳粹政治经济学 <https://pseudoerasmus.com/2015/05/06/fascists-part-2/>

Maito, Esteban Ezequiel. "The historical transience of capital: the downward trend in the rate of profit since XIX century." (2014).

Bry, Gerhard. Wages in Germany. Univ. Pr., 1960.

Jostock, Paul, and Charlotte Boschan. "THE LONG-TERM GROWTH OF NATIONAL INCOME IN GERMANY."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5.1 (1955): 79-122.

革命是必然的？还是“合法”的？——与夏莹女士聊哲学

2017-5-14 03:35

原作者：“鱼雷快艇海鹰号”

在当今的世界历史条件下，是否还会爆发“革命”？这里说的“革命”，不是指的换汤不换药的“颜色革命”或者在统治者之间争权夺利的“政变”，不是指的简单的政治权力的更替，而是指的超越现存的社会制度、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具体来说，就是超越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世界体系及其历史时代。

对此，夏莹女士认为，社会革命虽然并非“必然”，却仍然可以是“合法”的；就是说，可以从哲学上、理论上给予辩护。夏莹女士对革命的“合法性”的论证，所依托的是“完成马克思思想的彻底化”，而“彻底化”的方法就是对马克思的“彻底批判”和“重构”，一方面拒斥“经济、阶级、生产”等概念，另一方面剔除马克思思想中“残存的形而上学”（如将“无产阶级作为革命的先天选民”、“共产主义作为历史的必然目的”等）；据说，在经过了这样的“彻底批判”之后，便可以坚守马克思思想的“核心”。（见夏莹，“统一性哲学的断裂与革命理论的合法性论证——马克思及其后继者的哲学贡献”，《激进阵线联萌》2017年5月8日，<https://mp.weixin.qq.com/s/pVHg6UPzqeikDedC9y-Okq>）

夏莹女士是哲学家；虽然哲学的起源是无所不包的学问，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已经“术业有专攻”，成为分工体制下一门狭隘的专业，游弋于精神的“彼岸”。不过，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作为“彼岸”哲学的“此岸性”毕竟是要在现实世界中证明的；而夏莹女士对革命“合法性”的论证，也确实是在探讨“此岸”的问题，即理论能否变为“物质力量”的问题。再者，笔者勉强还可以算一名哲学爱好者，粗通一些“话语”、“范畴”，并且与夏莹女士确实有一些理论上和政治上的分歧，所以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下面，与夏莹女士着重探讨这样几个问题：在当前的世界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是不是革命的主体？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夏莹女士所说的“苏联事件”）是否构成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证伪？人类历史是不是有规律可循，规律是不是可以认识？（与此相关的问题是：资本主义是不是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即无阶级社会是不是必然胜利？）

谁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

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造成一个数量不断壮大、组织不断加强、阶级觉悟不断提高的雇佣劳动者阶级（即“现代无产阶级”）；这个阶级又必然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即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革命“主体”）。这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一个著名论断，也可以说是理论假说。

应当说，这个假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被验证。这当然是所有的当代马克思主义者都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这是我与夏莹女士分歧的一个方面。

在夏莹女士看来，整个的二十世纪社会主义革命失败了，而在西方，工人阶级也没有成为马克思所预言的“自为”阶级，资本主义没有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自行消亡”。这样，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就“彻底失败”了；“现实对理论的证伪”将马克思主义“推上了理论的审判台”。

夏莹女士认为，要“坚守”住马克思的思想（或者说，说白了，马克思主义如果还要作为一种理论生存下去），就要与“传统的教条主义的马克思思想”决裂，建构某种“非先验”的革命主体和革命目标。

所谓“非先验”的革命主体，就是说，没有哪一个阶级（或者哪一个社会集团）注定是革命主体。所谓“非先验”的革命目标，就是说，革命不是必然的，革命的动力不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必然结果，而是某种“应然与实在之间存在的永恒张力”，或者说，在社会“应该怎样”与“实际上怎样”之间所存在着的、永远不会消失的冲突和矛盾。

如何将这种“张力”转化为现实的社会变革，完全是偶然的，取决于“文化领导权”的归属；而所谓“文化领导权”，其本质是“暂时的话语连接”。无论是哪个社会集团，如果掌握了“话语实践的连接能力”，“将社会对抗的各个方面整合起来”，就可以成为“革命主体”。这样一种“革命主体”，据说是“非本质”的、“非先验”的，它不属于任何一个阶级，但是“主体的空位”永远不会被“消解”。

夏莹女士所推崇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或者“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表面上，这些理论坚持革命主体是可以“建构”的，而实际上，“主体”已经被抽象为“主体的空位”，与社会的物质生产和生活条件失去了一切有机联系，因而也就与历史失去了一切有机联系。这样的“主体的空位”好像随时可以被填充，但是因为纯粹是话语的建构（也可以说是精神的想象），也就永远不能被填充。因为将这样的“主体的空位”建构出来的“理论”，既不能说明一定的“话语连接”所赖以产生出来的实际历史条件，也不能说明这些历史条件如何产生、发展和变化，也不能说明“话语实践”如何奇迹般地转化为社会实践和“物质力量”，更不能说明社会各阶级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面对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而无产阶级被剥削和被压迫的现实，而阶级力量对比变化的趋势既不是必然的也不是可以认识的，所谓的社会革命的“可能性”、“永恒空间”也就无非是革命低潮时代小资产阶级“激进左派”分子聊以自我安慰的精神鸦片、在无限的偶然性中期待着命运眷顾的神奇一瞬而已。

在历史的实践中，“西方马克思主义”既没有获得“文化领导权”，也始终没有找到那神奇的“话语连接”，不仅没有实现超越资本主义的“革命”，并且在新自由主义的进攻下节节败退。如果说，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据说是“失败”了，那么，“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在其影响下的“欧洲共产主义”又能够以什么样的“事件”来标榜自己的成功呢（除了若干“理论家”仍然出没于大学讲台以外）？

西方马克思主义所产生的历史背景，是欧洲上世纪二十年代工人革命的失败以及改良主义在西欧工人运动中取得统治地位。这些历史现象，归根结底，要用西方工人阶级在世界历史上所处的实际的物质生产和生活条件来解释。在《帝国主义论》中，列宁已经指出，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剥削得来巨大的“超额利润”，从中可以拿出一

部分来，用于收买“工人贵族”，培养“修正主义”的物质基础。将列宁的观点应用于更加广泛、更加一般的情况，可以认为，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存在着核心、半外围、外围等不同的结构性层次，核心国家通过不平等交换等手段攫取了外围、半外围所生产的大量的剩余价值，并用其中一部分通过高工资、社会福利等方式与本地区的工人阶级和城市中产阶级分享，以此来求得内部的阶级妥协和社会稳定。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西方工人阶级实际上占有了世界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因而成为改良主义（乃至帝国主义）在事实上的受益者和支持者。有什么样的“话语连接”能够颠覆改良主义的这一物质基础呢？事实上，到目前为止，也还没有任何“话语连接”（而不是物质生产和生活条件）能够在西方或非西方的任何地方“建构”出革命主体。

另一方面，在二十世纪的世界历史进程中，革命主体并没有“空位”，而是在广大的外围、半外围地区蓬勃发展。当然，实事求是地说，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并非马克思原先所设想的无产阶级革命，而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激进民族解放运动。在一部分半外围、外围地区（分别以俄国和中国为代表），旧统治阶级不能够有效动员经济剩余以应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所强加的挑战，只有通过将底层广大劳动群众充分动员起来并摧毁旧的国家机器才能创造资本积累和工业化所需要的基本社会条件。正是在这样的客观历史条件下，才形成了事实上以出身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知识分子为领导、以农民为主要力量的“革命主体”，并相应产生了“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样的“话语连接”。这一“话语连接”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东方”国家现实存在的阶级关系及其历史矛盾在革命知识分子头脑中的反映；也只有正确地把握现实存在的阶级关系和历史矛盾，这一“话语连接”才能通过土地革命、红色政权、统一战线等物质力量最终达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从二十世纪到二十一世纪

在夏莹女士看来，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毫无疑问是失败了：“苏联大清洗的政治悲剧让马克思成为宏大历史叙事的代言人，在其中个人的自由与生命的意义在理性化的理想面前可以被随意践踏”；“苏东裂变的政治变革则似乎以不争的事实证明了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彻底失败”；“20世纪政治格局的大变革将马克思的思想推上了理论的审判台”；“传统马克思主义”被证伪（这里且不论苏联资本主义复辟以后广大劳动人民沦为赤贫乃至人均预期寿命大幅度下降的事实又如何体现了“个人的自由与生命的意义”）。

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实现马克思所设想的无阶级社会，也没有向无阶级社会真正地过渡。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失败了。至于在历史上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没有向无阶级社会过渡，而是出现了新的阶级压迫和剥削，这完全可以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来认识和解释（特别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是阶级社会赖以产生和存在的物质基础的观点），此处暂不赘述。

另一方面，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实际可以完成的历史任务，就是在对劳动群众较为有利的条件下充分动员经济剩余以完成资本积累和工业化，以巩固并提高它们作为民族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地位。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国家”确实完成了这个它们实际上可以完成的历史任务，因而也就证明了它们在历史上的存在理由，也可以说证明了它们在历史上的“合法性”。

不仅如此，因为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还加速了世界范围民族解放运动发展和胜利的进程，为西方国家工人阶级争取更好的社会改良创造了外部条件，从而使得世界范围的资本积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并且在这个意义上推动了世界历史向前发展。

所有这些，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又有怎样的关系呢？按照夏莹女士的概括，“传统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造成一个日益发展壮大的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必将成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革命主体”即资本主义的“掘墓人”。那么，到目前为止，西方的无产阶级确实还没有成为革命主体，而历史上东方的革命主体又不是无产阶级，这是不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证伪呢？

历史不是静止的，而是不断发展的；历史的发展不是直线式的，而是曲折的、辩证的，通过“否定之否定”螺旋式上升的。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实现无阶级社会，但是却将世界范围的资本积累推进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就为二十一世纪初世界范围无产阶级化的大发展创造了条件。无产阶级化的历史进程，不再限制在少数西方国家，而是扩展到大多数东方国家。

当大多数的半外围、外围国家发生并完成无产阶级化以后，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又不具备条件用来自世界其它地方的剩余价值来收买“工人贵族”或建立阶级妥协，从而无产阶级的历史性要求与资本积累的界限无法兼容，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才可以真正验证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成为资本主义掘墓人的假设。

不仅如此，伴随着外围、半外围国家无产阶级历史性要求的增长，从而核心国家通过不平等交换攫取超额剩余价值的机制被破坏，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核心国家原有的阶级妥协也将分崩离析（这不是正在我们眼前发生吗？）。按照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西方国家的无产阶级，或许也可以在不远的将来，按照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重新发现自己的“主体性”，并证明自己而不是其他什么阶级或者什么“主体的空位”才有资格作为“革命的主体”。

资本主义必然灭亡

夏莹女士认为，“马克思思想的核心精神”，是“批判”与“革命”。为什么这两个概念是马克思思想的“核心精神”、评价“核心精神”的标准是什么，夏莹女士并未说明。夏莹女士对于“革命”的理解，已经在上面介绍。夏莹女士所说的“批判”，指的是康德式的“批判”，即“形而上学”。

在哲学中，“形而上学”是一个费解且多有歧义的概念。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形而上学”，是与辩证法相对的，指的是孤立的、静止的认识世界的方法。夏莹女士不是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的，而是在康德的意义上，将“形而上学”理解为人们的经验以外、由“先验”（信仰）所认定存在的东西（“自在之物”）。

按照夏莹女士的理解，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拒斥了“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性”、强调了“主体的有限性”。黑格尔将历史理解为“绝对精神”的实现过程，因而“存在即合理”，并因此而实现主观和客观的统一、思维和存在的统一。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在夏莹女士看来，是“形而上学的统一性”（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是先验的“自在之物”）。马克思的“批判”，推翻了现实世界是“理性”的实现这一黑格尔的“形而上学”，从而与康德的“批判”相契合。按照康德的观点，主体是有限的，就是说，人类认识世界的能力是有限的，只有“经验”到的世界（人们通过感官接触到的世界）才是可认识的，而“自在之物”是不可认识的；在“经验”与“自在之物”之间，在存在与思维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

夏莹女士认为，正是这种现实与思维之间的“永恒的张力”（现实永远不符合理想），才保证了现实的“开放性”，并为斗争和革命提供了“合法性”。既然“理性”不能在现实中实现，历史就是没有“目的”的，而只能是无限的偶然性。任何认为历史是有规律可循的观点，都是一种“既定的安排和规划”，是“形而上学”，是对“革命的合法性”的破坏（因为革命的“合法性”只能来自于历史的偶然性）。

从这样的观点出发，夏莹女士认为，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分析”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设想”都属于“形而上学的残余”。只有对马克思“彻底批判”，将马克思的思想从“形而上学”中拯救出来，才能将马克思的思想“彻底化”并“坚守”。

正如恩格斯所说，思维与存在是否统一，即人的认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外部世界是否可以认识的），是哲学的两大基本问题之一。承认人的认识是可以符合客观实际的，是可知论。不承认外部世界是可认识的，是不可知论。康德的“自在之物”就是一种不可知论。在恩格斯、列宁、毛泽东所主张的辩证唯物主义看来，人的感官经验固然不是外部世界的全面准确反映，因而人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往往从局部的、片面的、支离破碎的感性认识出发，但是感性认识可以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上升到理性认识（形成对外部世界规律性、概括性的认识），理性认识指导着人们的实践并接受实践的检验；在实践中，人们获得新的感性认识、新的理性认识。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过程，人类的认识逐渐地符合客观实际的本来面貌，并由浅入深、由表及里，逐

渐认识到各种事物的本质和运动规律，从而通过相对真理的不断累积而接近绝对真理。因此，在人类的经验世界与“自在之物”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人类的循环往复的实践就是跨越鸿沟的桥梁。

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看来，在由认识到实践的每一个阶段所形成的理性认识，都来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来源于感性却“高于”感性。比如，将各个盲人摸象所得到的局部感性认识综合起来，就可以获得较为完整的对“象”的理性认识；将人们对于各种各样的马的感性认识综合起来就可以得到“马”的概念。如此得到的理性认识，不是“先验”的观念，而是来自于外部世界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并将这些反映总结起来。“马”的概念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客观存在的，这可以由所有的马都有相同或类似的生理结构和功能得到证明。否认“马”是客观存在的，就必然要陷入“白马非马”的谬论。

当然，上面所描述的，只是人们分别认识“象”和“马”的一个阶段。人们要对“象”、“马”乃至整个外部世界达到比较正确、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认识，往往要经过从实践到认识的多次反复和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

有意思的是，在追求马克思思想“彻底化”的过程中，夏莹女士对于上述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只字未提，甚至不屑于给予“批判”。

从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出发，人类的历史活动也是外部世界的一部分，因而也是有规律可循的，其规律也是可以认识的；认识历史规律的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也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往复。

夏莹女士虽然承认“现实条件对于人的活动的约束性”，但是却不承认“约束性”也就意味着“必然性”。比如，人都要吃饭睡觉，这既是“约束”，也是必然。不管古往今来，不管世界各个地方的人们，有多少个体的差别，有多少奇风异俗，有多少偶然性，所有的人都只有在“吃饭、睡觉”的条件下才能生存和发展。

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包括资本主义）都是一定历史条件约束下（首先是在物质生产和生活条件约束下）的产物并且也只有在一一定的历史条件的约束下才能存在和发展。另一方面，

一切的历史条件又必然是不断地发生、发展、变化的；因而或迟或早，现存的社会制度要与外部的历史条件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当现存的社会制度赖以存在的一系列历史条件不复存在或者被严重破坏的时候，现存的社会制度也就必然不能够再存在下去。

除非历史条件不再发生、发展、变化，或者有什么可以不依赖于一定历史条件而存在的社会制度，否则，万古长存、永恒不灭的社会制度是没有的。

在这样的意义上，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是必然要灭亡的。当然，对于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到底要依赖于哪些历史条件，这些历史条件的发展变化遵循哪些规律，变化了的历史条件又会如何与资本主义发生尖锐不可调和的冲突，等等具体问题，人们的认识是不可能一下子就符合客观实际的，而是要经过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

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也不属于哲学的任务，而是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并且要经过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长期、反复检验。要真正回答这些问题，也就是说，对这些问题后面的历史规律得到比较正确、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认识，就不但不能“拒斥”，而是必须深入了解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阶级、生产”等实际过程。

当然，人们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阶级、生产”等实际过程及其规律的认识，也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要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提高，并有可能要经过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马克思的思想也是如此。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必然成为资本主义掘墓人的思想”，其中的一部分（资本主义发展必然导致无产阶级发展壮大）已经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到目前为止的发展所证明，另外一部分（无产阶级成为掘墓人）还有待于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未来的发展中得到验证。马克思最初的一些设想，如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在西方几个国家爆发，当然已经被实践所否定。但是经过二十世纪世界范围阶级斗争的实践，马克思主义通过自身的发展获得了对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运动规律更完整、更准确的认识，包括核心剥削外围的规律、世界范围剩余价值再分配作为西方工人运动“修正主义”的物质基础、外围和半外围地区的革命规律、外围和半外围地区无产阶级发展的规律以及未来在世界范围全面验证“掘墓人假设”的可能性。所有这些，都不是什么先验的“形而上学”，而是人们（通

过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历史规律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相对真理到绝对真理,逐步达到正确认识的过程。

所有的人,每天都要进行各种各样的活动,比如,要从甲地到乙地,为此就必须做出“既定的安排和规划”。这些“安排和规划”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因而不是“先验”的、“形而上学”的,而是从人们以往的实践活动中获得的经验总结出来,并概括为某种“理性认识”

(这种“理性认识”,可能只是表现为人们头脑中的“路线”,也可能表现为“地图”,还可能较为“感性”的用实时卫星导航表现出来)。这样的“既定的安排和规划”在日常生活中往往是比较符合实际的;但是也有可能是不符合实际的,这时就要根据新的实践所获得的新的经验校正我们的认识,形成新的路线图,并做出新的“既定的安排和规划”。

然而,按照“批判”的哲学家们的意见,一切“既定的安排和规划”,都必然是“先验”的,是“形而上学”或者“形而上学的残余”,因此必须加以“拒斥”。或许,“批判”的哲学家们每天的活动,都是可以不经过“形而上学”的“既定的安排和规划”,而是要永远地保持“应然与实在之间的张力”,只需要通过“话语连接”来保留现状与目的地之间的“永恒空间”就可以了。毕竟,革命的“合法性”高于一切,而革命的“必然性”(即革命的实现)不仅是无关紧要的,而且是“形而上学”的,只能“拒斥”并“批判”。

至于人类自进入文明以来即处于其中的阶级社会,则是一种在更大历史范围内起作用的社会制度。这种社会制度,也是有规律可循的,也必然要经过产生、发展到灭亡的过程。人们对于阶级社会产生、发展、灭亡规律的认识,当然也要经过反复的实践和长期的过程。其中有些问题,比如,资本主义社会是否将创造这样的历史条件,使得资本主义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对抗性生产方式”,人类的“史前史”是否将由此终结,等等,可以进一步探讨并在未来的世界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斗争进程中得到新的验证。

简单说说 1962 年中国为什么在战胜后撤军

2017-8-2

原作者: 远航一号

马列托主义者说：“毛打印度最终还是失去了一块地，不知毛派是如何想的”。

马列托主义者（以及很多人）对当时情况根本不了解。

建议读澳大利亚记者 Maxwell 撰写的 India's China War 该书有中译本，叫《印度对华战争》

Neville Maxwell, India's China War (Jonathan Cape Ltd, 1970)

这里有一则近年的《南华早报》上的报道

<http://www.scmp.com/news/asia/article/1461099/neville-maxwells-revelation-reveals-india-was-hiding-nothing-over-its-1962>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政府了解在中印边界东段存在着争议。当时中国政府的立场是，决不能承认英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印两国人民的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但是考虑到达旺等藏南地区事实上已经为印度所控制，可以在两国平等谈判的基础上，划定新的边界；新的边界可以在事实上（不是法律上）大体按照麦克马洪线的走向。在中缅边界谈判中，中国就是采取了这样的立场。

（这里要说明的是，在英印政府时期，根据英帝国主义战略需要，其所主张的边界，多次发生变化；在整个英印时期，其实际控制线基本上就是中国政府后来所说的传统习惯线；一直到印度共和国成立以后，才突然加速了向北蚕食的进程；大概是在 1950 年前后，印度军队强行驱逐了几百年来一直在达旺地区行使行政和宗教权力的西藏地方政府势力，并在解放军进藏以前将印度的实际控制区推进到了麦克马洪线）

但是中印边境争端在 1959 年以后真正激化，却不是因为东段，而是因为西段。在十九世纪中期，英印政府为了最大限度地限制俄罗斯势力范围的目的，曾经设想将中印边界西段一直向北推到昆仑山脉（不是现在的喀喇昆仑山脉），这就是所谓的“约翰逊线”。约翰逊线提出后，从来没有作为外交照会向中国政府提出过，只是存在英印政府的档案里。后来印度方面就是根据这个本来已经被英印政府弃用、存在档案里的约翰逊线，一口咬定，中印边界西段已经“划定”，不容谈判。

昆仑山脉与喀喇昆仑山脉之间的地区，就是阿克赛钦。历史上是无人区，历史上任何印度的土邦或英印政府从来没有有效控制过。五十年代初，中国开始在那里修建新藏公路。公路修了好几年，印度根本不知道。印度方面最早发现那里有公路，竟然是通过中国的宣传画报上所附的一张地图。因为地图太小，印度还不敢确认中国的公路是否确实通过了印度主张的领土，于是就派士兵去侦察。头一年派去的几个士兵都冻死了，没有回去。后来费尽周折，总算是“确认”了，中国已经“侵入”了印度领土，于是尼赫鲁向周恩来提出正式抗议。这是中印边界争端的转折点。

印度在西段的无理要求完全出乎中国政府方面的预料。中国方面以各种方式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诱之以利，均无效果。毛主席还曾经匿名请外交部转达给印度方面一封十分坦率的信，大意为，中国的主要战略方向在东方（美帝、国民党蒋帮），不在西方，中国不可能那样蠢，蓄意与印度为敌，造成两线作战。印度方面竟然以信件语言粗鲁、不合外交礼仪为由拒绝接受。

1960 年，周总理在顺利完成中缅边界谈判（事实上确认了中缅段的麦克马洪线）以后马上访问印度，做最后的努力。当时中国方面的谈判方案实际上就是，如果印度在中印边界西段可以基本上接受中国主张，则中国在中印边界东段（麦克马洪线部分）可以基本上接受印度主张。这个妥协方案被印度方面断然拒绝。

此后，由于印度国内政治的发展，迫使尼赫鲁政府要向中国“收复失地”，于是就出现了印军哨所在中印边界东西两段都全面推进的奇观。其中，在东段，印军哨所甚至在多处设在了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北。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才开始了全面的自卫反击战，在军事上取得全胜以后，在西段收复了全部阿克赛钦地区，在东段则恢复到 1959 年的双方实际控制线（大体符合麦克马洪线）。

可见，1962 年中国方面在战胜以后又撤军，并在东段退到实际控制线以后，决不仅仅是如现在网络上所说的，单纯是为了某种军事上的便利（如藏南守不住），或者图得某种虚名，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中国当时的边界政策，除了建立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外交总原则以外，完全是现实主义的：即在与周边国家确定边界时，必须要照顾到双方的实际利益以及历史感情，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多得一些领土，而是为了有一条符合双方实际情况的长期稳定的边界。这里，边界的“长期稳定”，是当时中国政府关注的最主要的方面；为了这个主要的目的，当时的中国政府愿意做出一些合理的让步。

当然，既然说要照顾到双方的实际利益和历史感情，就不可能是单方面的。周恩来就向尼赫鲁讲过，不能只讲印度人民对喜马拉雅山的感情，不考虑中国人民对喀喇昆仑山脉的感情。而当时印度政府采取的办法是，根本不承认中印边界存在争议，而是坚持边界已经划定，完全不能谈判，凡是不符合印度主张的地方，都是中国侵略。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才不得不断然反击，并完全实现了自己预期的政治和军事目的。

既然印度方面完全拒绝谈判，不承认中印边界存在争议（即印度所主张的边界不容讨论），那么中国政府除了在西段坚持并实现自己的主张以外，在东段，在未来的谈判达成协定以前，在外交上自然也必须坚持关于传统习惯线的主张。这绝不等于说，中国 1962 年对印自卫反击战的实际目的，就是为了收回整个藏南地区，而没有收回就是失败了。

简单分析一下中国房地产价格的构成

2017-8-7

原作者：“鱼雷快艇海鹰号”

最近一个时期，房地产市场的进一步泡沫化，已经引起了广大劳动群众乃至相当一部分城市中产阶级的不满，成为中国的一个严重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正如最近盛兴瑞先生撰文指出（见“雄安新区应探索建立公有民租新住房制度”），目前房地产泡沫的根源在于事实上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住房制度必然导致住房金融化以及随之而来的投机泡沫。要根治房地产市场的痼疾，只有广泛实行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公有民租”的住房制度。然而，只要仍然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其决定性作用”这一错误路线，就不可能真正落实利国利民的公有民租住房制度。

要严肃地讨论房地产市场问题，需要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下，对于房地产（特别是住房）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产和销售状况做出严肃、可靠的分析。遗憾的是，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目前在一般大众的讨论中，还严重缺少这样的分析；网上关于房地产市场的各种言论，包括一些著名进步学者的言论，难免流于空泛，乃至凭主观臆测、道听途说，随意做出并不正确或并不可靠的结论。

在这篇短文中，笔者尝试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简单分析一下中国房地产价格的平均构成。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出发，房地产作为商品，虽然有其一定的特殊性，但是从长期平均来说，其价格要围绕价值波动；即由商品中所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

这里说的，价格围绕价值波动，指的是商品最终销售的价格要围绕价值波动。比如，说工业品的价格围绕价值波动，指的是工业品最终销售时的价格，而不是工业品出厂时的价格。熟悉政治经济学的朋友知道，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产业资本家在销售出厂产品时，并不能获得相当于产品全部价值的价格；为了节约流通成本，产业资本家愿意将商品价值中的一部分让渡给商业资本家；商业资本家在买进和卖出商品之间的商业加价，其本质不是商业资本家雇佣商业工人生产的新价值，而是产业工人已经生产出来的价值的一部分。类似的，房地产企业实际上是房地产流通领域的“商业资本家”。房地产企业并不生产新的价值，而是通过建筑业资本家（相当于房地产或建筑业领域的“产业资本家”）让渡的一部分价值来获利。

这样，我们可以初步分析一下房地产价值的构成。所有商品的价值都包括两个部分，因为在生产商品过程中消耗的各种生产资料所转移到新产品中的价值以及劳动者在生产商品时新增加的价值；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者新生产的价值又可以分为补偿劳动者的劳动力价值的部分和剩余价值。

就房地产来说，为了生产房地产所消耗的生产资料显然包括在建筑房地产过程中所消耗的各种原材料（钢筋水泥等）、水电气等辅助材料以及机器设备的折旧，即建筑业所直接使用的各种生产资料。此外，为了建设房地产，一个必不可少的生产资料就是土地。从政治经济学观点看，纯粹以自然状态存在的土地是自然资源，不是劳动产品，因而也不是商品，没有价值。但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纯粹以自然状态存在的土地几乎已经不存在了。一般来说，要建设房地产，必须改变现有土地的用途和存在形式；比如，要建设必要的基础设施（平整土地；通水、通电、通气等），原来的土地使用者（如农民或城市居民）要给予适当的安排，并要为他们改变生活方式而支付相应的费用。为了上述目的而发生的社会劳动属于为了改变土地使用目的而发生的社会必要劳动，是生产价值的；因此而发生的价值应当作为房地产所消耗的生产资料价值的一部分转移到房地产的最终价值中。

除了房地产所消耗的生产资料的价值以外，房地产价值中的其他部分，都是由生产性工人（即建筑业工人）在建筑业的生产活动中创造的。建筑业工人所新创造的价值，在扣除建筑业工人的劳动力价值以后，其余部分，都是由建筑业工人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房地产所包含的剩余价值，又包括以下一些部分：建筑业企业的利润和税收；房地产企业的利润和税收；房地产企业的工资和其他一些直接经营成本；地租。（注意：房地产企业工人的工资也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正如商业工人的工资也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一样）

地租的情况有一定复杂性。只要存在着土地私有权（或者事实上的土地私有权），就会因为土地私有者对土地的垄断而产生地租。就整个社会来说，地租必然是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但是具体到一个行业，比如房地产，房地产价格中所包含的地租既可能是来自于房地产本身所包含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是来自于其他行业剩余价值的转移。问题在于，在中国经济的具体条件下，房地产价格中，地租的比例到底有多大，是不是如某些网上言论所认为的，大到了对整个房地产业乃至整个中国经济其决定性作用的地步？

由于统计数据的滞后性，下面只能主要是依靠 2016 年《中国统计年鉴》所发表的 2015 年的中国经济数据做一些初步分析。当然，2015 年的房地产市场情况与 2017 年有很多不同；但是还是可以说明一定的问题。

2015 年，中国房地产企业的全部主营业务收入为 70174 亿元，相当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685506 亿元）的 10.2%。当年，中国的全部商品房销售额为 87281 亿元。商品房销售并非全部由房地产开发企业进行，而房地产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也并非全部是商品房销售收入（虽然主要是商品房销售收入）。为了简便起见，下面假设房地产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全部是商品房销售收入，并假设房地产企业所销售的商品房价格可以代表商品房价格的平均情况。

房地产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中，营业利润为 6166 亿元，主营业务税金附加为 6202 亿元，占主营业务收入之比均为 8.8%。此外，营业利润（含企业所得税）与房地产企业所有者权益（123238 亿元）之比为 5.0%。无论是与主营业务收入相比，还是与所有者权益（即净资产）相比，房地产企业的营业利润均非特别高，属于资本主义竞争条件下平均利润的范围。

从主营业务收入中扣除营业利润和主营业务税金附加以后，房地产企业的主营业务成本为 57806 亿元。《中国统计年鉴》没有提供主营业务成本的具体构成，但是提供了关于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如下一些情况。

2015 年，房地产企业的土地购置费用为 17675 亿元；房地产企业竣工房屋的总造价为 30552 亿元。如果房地产企业的土地购置费用和竣工房屋总造价都摊入当年的主营业务成本，据此可以粗估，房地产企业的其他成本（工资、利息、折旧等）约为 9579 亿元。

据此可以对房地产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做如下初步分析。2015 年，中国房地产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构成如下：土地购置费用，25.2%；房屋造价，43.5%；房地产企业经营成本，13.7%；房地产企业营业利润，8.8%；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8.8%。

根据这些数据，可以初步推算，中国的房地产价格中，大约 75% 属于建筑业直接创造的价值，其中大约六成（总价格的 44%）属于建筑业的物质生产成本以及建筑业工人和资本家的收入，另外四成（总价格的 31%）属于建筑业生产价值中向房地产业让渡的部分，构成房地产业的经营成本、利润和税收。

在中国，地租主要采取土地销售价格的方式。但是，并不是说，全部土地销售价格都是由地租构成的。据财政部数据，2015 年，中国全国土地出让收入 33658 亿元；全国土地出让支出 33728 亿元；土地出让支出中，属于征地拆迁补偿、土地前期开发等成本性支出 26845 亿元，占当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的 79.8%。

假设房地产企业土地购置费用中属于征地拆迁补偿、土地前期开发等改变土地用途必要费用的一部分与全国土地出让收入中成本性支出的比例一致，那么土地购置费用的大约 80%（房地产总价格的 20%）则属于为了改变土地用途而发生的必要的生产性支出，其所对应的价值应转移到房地产商品的最终价值中。

综上所述，在 2015 年中国的房地产价格中，全国平均来说，由建筑业直接生产并让渡的价值占全部房地产价格的约 75%，其中让渡给房地产业的部分占总价格的 31%；由于改变土地用途的必要生产费用而转移到房地产价格中的价值占总价格的 20%；纯粹以地租形式出现的部分仅占房地产总价格的 5%。

当然，以上仅反映了 2015 年全国平均的情况。过去两年中，全国房地产市场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此外，一二线城市的情况又不同于全国平均的情况。在全部房地产价格中，有近三分之一，属于让渡给房地产企业的部分，与一般商业企业所获得的让渡价值相比，房地产企业所获得的让渡价值显著偏大，其中是否有一部分属于变相地租，还有待于进一步分析。

在全部房地产价格中，让渡给房地产企业的部分（含经营成本、利润、税收）占 31%，与直接建筑成本和土地购置费用之和（69%）相比，房地产企业的平均“加价率”高达 45%。相比之下，仍据 2016 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2015 年，中国批发业的平均加价率是 8.6%，零售业的平均加价率是 16%，两者相加约为 25%。

如果假设，房地产企业的正常加价率也是 25%，那么房地产企业所获得让渡价值中约 44%（ $20\%/45\% = 0.44$ ）可能属于变相地租，则变相地租占全部房地产价格的比例大约为 14%，与直接形式的地租相加则占全部房地产价格的 19%。如上所述，2015 年房地产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约 10%；那么，其中的地租部分（包括直接的和变相的），应该不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 2%。

“中帝论”可以休矣 —— 评洞朗事件告一段落

2017-8-30

原作者: 远航一号

近年来，在相当一部分马列毛左派同志中，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中国不仅是资本主义，而且已经发展为垄断资本主义，这些垄断资本并且集中在据说控制着国民经济“战略部门”的国有资本手中。这些同志，照搬列宁在一个世纪以前为了分析当时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和阶级斗争形势提出的《帝国主义论》，认为垄断资本主义必然导致资本输出，资本输出必然导致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为了瓜分和重新瓜分殖民地而发生尖锐不可调和的冲突，并最终导致世界大战。

持有这样观点的同志认为，中国资本主义已经越来越强大，中、美两大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最终必然导致二者之间的争霸战争，只有这样的战争才能引起革命，除此以外，实在想象不出中国资本主义还能面临别的什么根本矛盾，如果中美战争一直不爆发，中国和世界资本主义也只是一直强大下去。还有些同志则认为，战争是包治资本主义百病的灵丹妙药，无论什么样的资本主义矛盾，无论什么样的危机，只要枪炮一响，经济危机就可以克服，政治合法性的不足也马上可以得到弥补，在民族主义狂热的裹挟下，中国的无产阶级（更不必说小资产阶级）将忘记自己的一切阶级利益，紧随当今的波拿巴，无怨无悔地为中华帝国主义充当炮灰。

相比之下，远航一号是怎样看待这些问题的呢。在两年多以前，在与托派分子白曼的辩论中，远航一号就指出，就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地位来说，中国是一个半外围国家（其经济方面则仍有相当的外围的特征）；就其世界资本主义分工体系中的职能来说，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比较优势”是在剥削廉价劳动力、廉价资源基础上的出口制造

业。这些基本特点决定了，中国资产阶级与美国资产阶级的基本利益高度一致，在资本主义积累的根本方面，中美资本主义不仅不冲突，而且中国资本主义对美帝国主义在经济上、军事上还高度依赖。远航一号并且预言，不仅中美之间不会爆发战争，就是在中国与美帝的仆从国之间也不会爆发战争，甚至不会发生武装冲突。

远航一号所没有预料到的，是中国资产阶级不仅不会与美帝国主义发生战争，而且还积极协助美帝国主义维持世界资本主义秩序，乃至不惜背信弃义，丧心病狂地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所谓“制裁”，将东北亚乃至整个世界推到了核战争的边缘。没错！核战争的危险不是来自于朝鲜政府和人民，而是来自于经常玩弄危险的战争边缘游戏的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

远航一号所没有预料到的，是中国资产阶级不仅不敢对美帝及其直接仆从国舞刀弄棒、擦枪走火，甚至对于并非与美帝结盟的印度资产阶级也不敢采取简单必要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起码措施。笔者曾经设想，洞朗之争，并不关乎世界资本主义大局，也不会从重要方面影响中国资本主义积累的既定发展；军事方面，无非是边境冲突，以稍稍牺牲印度资产阶级的利益为代价，扬一下“军威”，树一下领袖威信，对于中国资产阶级来说，是难得的合算买卖。

笔者不曾想到，原来中国资产阶级的“纸老虎”原形是没有底线的（除了在欺负朝鲜时，那确实是张牙舞爪、凶相毕露的，但是也不敢拿朝鲜怎么样）。现在洞朗事件已经告一段落，综合各方面报道，双方谈判结果，中印双方军队脱离接触（实际即印度方面所要求的双方一起撤军），中方停止修建公路；中方事实上默认，自本来毫无争议的中国锡金边界以东至中国不丹边界以西之间的洞朗地区成为所谓中国与不丹之间的争议地区，中国此后再无权利在这一地区单方面“改变现状”。

洞朗这块地方不大，但是它揭示了一个真理，那就是内外矛盾重重的中国资本主义是绝不可能成为所谓帝国主义霸权的。至于民族主义的强国论也可以休矣。姑且引用一段网上民族主义分子的评论：

洞朗事件的结局也同时意味着一带一路的破产。搞一带一路，中国的想法很简单，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一起和气生财，一起赚钱，共同富裕。但问题是中国好像忘了一件事，如果有事情怎么办，比如哪个国家的输油管被割断了，哪个国家的港口被侵占了，哪个国家搞政变了，你中国能出面么？你能保护么？保护不了你怎么让人家跟着你混？现在中国底牌被揭了，他连自己的国家利益都保护不了，你让别的国家怎么相信你？美国在全世界干这干那，那身后可是有十几艘航空母舰以及随时准备出动的海军陆战队。你中国有什么？出事了，就知道当和事佬？就知道往后面躲？就这还想当老大搞一带一路？回家洗洗睡吧。（摘自华岳论坛）

这个民族主义分子的失望，也可以反过来证明仍在一部分左派同志中流行的“中帝论”的错误。奉劝仍然在主张“中帝论”的许多青年同志，还是要相信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敢于、善于看穿中国资本主义纸老虎的本质，不要再用“中帝论”自己吓唬自己。

毛主席说，要“实事求是”；列宁说，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20世纪初期的世界资本主义矛盾和阶级斗争条件不同于21世纪初期的世界资本主义矛盾和阶级斗争条件。列宁主义的革命策略——“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是建立在俄国无产阶级尚不强大而西欧无产阶级又普遍陷入改良主义泥坑的历史条件下的。

今天世界人民力量的强大，已经足以制止主要资本主义大国之间的战争；过去几十年的世界资本积累，并且在世界的东方造成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最大的无产阶级。正如二十世纪中期的中国革命不是照搬二十世纪初期的俄国革命；二十一世纪的未来的东方革命更不可能简单照搬二十世纪的革命经验。有着丰富和光荣革命传统的中国无产阶级，必然能够承

担起自己的历史使命，走出一条前人所没有走过的道路，完成前人所没有完成的伟大事业。

话实先生的“帝国主义论”——兼评小资产阶级左派的失败主义

2017-9-20

原作者: 远航一号

话实先生的数万言长文“帝国主义、超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崛起”发表在激流网上。在这篇长文中，话实先生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批判了他所理解的（或者他所歪曲的）世界体系理论，并且用了不少的篇幅批判了远航一号等人关于资本主义危机、关于中国前途的一些观点。

在话实先生看来，中国资本的崛起是当今世界最主要的事实，而中国资本中最大的集团便是国有垄断资本集团，这个国有垄断资本集团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集金融和工业资本为一体的，垄断性最高的，资本实力最雄厚的单一资本集团”。中国这个最强大的国有垄断资本集团在扩张中必然要与美帝国主义发生这样那样的冲突，进而展开争霸斗争。面对着这样的中国资本集团越来越强大的“事实”，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可以做些什么呢？话实先生的口号很响亮：“无产者和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共同反对一切霸权！”

但是，这里有个问题，如果中国的资本集团确如话实先生所说的非常强大，并且正在成长为霸权，那么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反对这种霸权的客观基础又在哪里呢？话实先生周围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反对这种霸权的动力又在哪里呢？既然在历史上英国的无产阶级、美国的无产阶级、德国的无产阶级、日本的无产阶级在这些国家争霸的过程中或夺取霸权以后都不曾反对霸权，或者局部反对而后失败，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相信，中国的无产阶级就要起来反对这样的霸权呢？为了将来的壮烈的失败？

表面上，话实先生声嘶力竭地批判民族主义，但是话实先生对于中国与世界的实际状况的认识有哪一个重大的方面，是区别于“工业党”、“强国派”分子的呢？两方面都认为中国资本集团空前强大、越来越强大，两方面都认为“中国崛起”不可阻挡，两方面都认为“中国崛起”以后必然要对外扩张，两方面都认为“中国崛起”以后必然要与美国争霸并有可

能夺得霸权。话实先生文章的“受众”是小资产阶级群众（话实先生冗长晦涩的文字，劳动者是看不了的），“工业党”、“强国派”分子多为小资产阶级群众。那么，在争夺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斗争中，话实先生除了他自己认为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正义感以外，还有哪些优势呢？话实牌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能当饭吃吗？

所以说，话实先生数万言长文的营养 = 零。

不过，万事万物都要一分为二。话实先生的长文也并非一无用处。话实先生的诸多错误，不是孤立的，而是在目前的一批小资产阶级左派积极分子中相当流行的。这些错误观点的流行，不是偶然的，而是中国小资产阶级现实的物质生活状况以及阶级斗争当前阶段特点的反映。透过这些迷雾，我们才能看到那隧道尽头的光明，识别无产阶级前进的方向。

帝国主义和战争

既然说到帝国主义，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论述。在列宁看来，十九世纪末，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垄断资本为了攫取廉价资源、廉价劳动力和新的市场，而大量输出资本。这种资本输出为垄断资本家带来了“超额利润”，并且用超额利润的一部分收买了“工人贵族”，这些“工人贵族”事实上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主要社会基础。请话实先生注意，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贵族”占有了世界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不是后来的资产阶级培养的“马列主义研究者”的发明，而是列宁的观点。虽然列宁当时仅仅提到了“工人贵族”，第二国际工人运动的大多数被改良主义夺取了领导权是不争的历史事实；并且当时恩格斯在通信中已经提出过整个的英国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化”的问题。全世界无产阶级当然要联合起来，但是不是通过否认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核心国家的无产阶级客观上占有了一部分世界剩余价值这一世界历史事实。

列宁并且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为了获得资本输出的场所，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必然要瓜分世界，并将广大的亚非地区变为自己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这就是现代帝国主义，或曰资本帝国主义。各帝国主义国家相互之间必然要为了瓜分世界而展开斗争；

又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必然要求重新瓜分世界，当这种要求与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发生尖锐不可调和的冲突时，就必然爆发战争。

如话实先生所承认的，自列宁发表《帝国主义论》以来，世界历史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传统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没有爆发战争；自朝鲜战争以来，在传统的帝国主义国家和苏联、中国等新兴大国之间也没有爆发过战争。如远航一号在另外的文章所说明的，近年来，战争的形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的、举全国之力的大国之间的战争（更不必说主要大国之间的争霸战争）已经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世界头号霸权国家与若干中小国家之间的战争（并且在这些战争中经常被当地人民群众所打败）。在这样的新的历史条件下，除美国以外的其他主要国家的资产阶级不大可能将对外战争作为实现本阶级利益的一个主要手段。

话实先生承认不承认这一新的历史现实呢？他是坚决不承认的，但是又好像羞羞答答地要承认。

话实先生用了一大段篇幅引用了远航一号的一段论述，其中说：

在这个意义上，中美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不仅没有冲突，而且高度一致。这就决定了，不仅在中、美之间不会爆发战争，即使是在中国和美帝的仆从国（如日本）之间，也不会爆发战争，甚至连武装冲突都不会爆发。

然后，话实先生故作惊诧状：“人们不禁会问这个作者来自哪个星球？这种超帝国主义论的错误在于他们仅仅看到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上资产阶级利益的一致性，看不到垄断集团之间你死我活的争斗。他们似乎忘记了资产阶级的本性就是竞争、垄断、霸权！”

姑且不论，中美两国资本集团之间到底是“你死我活”的关系还是“夫妻关系”。请话实先生回答，远航一号的上述论断是否符合近年来国际政治的实际情况？是否很有可能也符合可预见将来国际政治的实际情况？

对此，话实先生先是以小粉红般的热情、《环球时报》般的政治正确为中国的崛起而惊叹：“军舰‘下饺子’式的快速增长，航母、航天和其他军备的投入，海外多个基地和

租界的筹建，‘一带一路’的推行、亚投行的成立、大规模的南海种岛，这一切都表示着他挑战美帝霸权的能力和胆量都在增强，更何况他的意愿。”

咱们姑且就把这些赔本赚吆喝都当作是对美帝的挑战吧。但是我们知道，话实先生所追求的是无产阶级解放事业，不是中国霸权。那么，话实先生接下来的结论就不能不令人沮丧了：“是的，在核武器的威胁下，直接的冲突不易发生，但是像南苏丹、缅甸等地的替代战争，越演越烈的航天、航海等的军备竞赛，捍卫各自所谓‘核心利益’的势力范围的争夺会连绵不断。”就是说，无论争夺如何“连绵不断”，南苏丹、缅甸有哪些内战（是否“替代战争”另当别论），军备竞赛如何热闹，中、美之间终究是“不易发生”直接冲突的。

既然如此，话实先生，你费了那样大的力气，批判了几个理论体系，除了得到事实上与“小粉红”们完全一致的中国强大论，又在事实上承认了远航一号关于“中、美之间不会爆发战争”的论断以外，还剩下哪些有那么一丁点用处的东西？

相比之下，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绝不仅仅是为了论证帝国主义争霸，而是指出帝国主义战争将使得“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的各种矛盾全面激化，从而造成“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阶级战争”的条件。

而在话实先生的洋洋洒洒中，帝国主义链条处处强大，无产阶级除了正义的词汇不剩下任何实际的力量。话实先生，你是在为无产阶级解放而写作，还是在为论证帝国主义坚不可摧而写作呢？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如话实先生所说，世界体系学说确有不同的门派，不可简单地一概而论。这也并不否认，这些门派相互之间仍然有着一些基本的共同点。

但是，像话实先生那样来概括世界体系学说基本观点的倒是真正的别处心裁：“当前替代列宁主义分析框架的最时髦的是考茨基超帝国主义论的现代版，即世界体系论。”“如果把世界资本主义也看成类似有机体一样的超越国家的‘体系’，那么，为了全球的资本主义，美帝称霸世界是合理的。…世界体系论一边谴责‘中心’国家对‘外围’的掠夺，

一边却在为美帝的世界霸权提供理论依据。”“这里牵扯到一个哲学问题，也就是‘世界体系论’强调的是资本主义世界的统一性，而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强调的是帝国之间的对立性。‘世界体系论’在哲学上就是 60 年代批判过了的‘合二而一’论的现代版。”

话实先生的逻辑理解能力真是妙不可言。世界体系理论家以及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内，美国霸权在客观上起了维护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共同利益并促进世界范围资本积累的作用。而在话实先生看来，这就是认为“美帝称霸世界是合理的”。照此逻辑，马克思主义从来不否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曾经起着进步的作用，那么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家剥削工人是合理的”了？

按照话实先生的见解，美国霸权就只能是维护美国资本的利益，而绝不可能是维护“世界资本主义的共同利益”。照此逻辑，不妨说，任何一个资本家都只有他的个人利益，而决不可能有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乃至任何一个阶级的个人都只有他的个人利益，而绝不可能有阶级意识。话实先生，你的这种国际观是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论呢，还是资产阶级“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那种庸俗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论？

话实先生说，世界体系论维护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统一性。恰恰相反，世界体系理论家沃勒斯坦是目前世界上著名社会科学家中认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矛盾已经造成其“结构性危机”并必然导致其灭亡的少数几人之一。沃勒斯坦的论断是符合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而话实先生事实上所主张的帝国主义越来越强大的观点则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

资本主义危机

话实先生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的观点，一言以蔽之，就是混乱。

在话实先生看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只能有一个根源，那就是生产过剩，其他一切危机理论都是错误的。

有一定政治经济学常识的人知道，一切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都表现为生产过剩的危机。但是如果说，一切经济危机都是由生产过剩引起的，从而只要消除生产过剩，便能消

除经济危机，这并不比医生说一切疾病都是感冒发烧引起的高明多少。就经济思想史来说，这无非是抄袭马尔萨斯和凯恩斯有效需求不足的学说而已。

我们知道，经济危机一旦爆发，必然意味着已经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不能够通过资本家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投资支出以及资本家的消费支出而得到实现。那么，资本家为什么不愿意维持（或扩大）投资支出的规模呢？显然，这个原因，只能从生产过剩以外去寻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积累的过程必然产生新的矛盾，这些矛盾在一定条件下会导致利润率的下降，进而引起积累危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工人阶级力量的发展，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工资占国民收入的份额上升、利润占国民收入的份额下降进而导致积累危机的历史现象。对此，话实先生向来是视而不见的。

那么，对于马克思的著名的因为资本有机构成上升而导致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话实先生又为什么完全回避呢？（除了提到不平等交换可以部分抵消利润率下降，但在探讨经济危机时则完全忽略）

大多数主张生产过剩是经济危机主因的理论家，都认为资本家对工人的过度剥削所导致的工人阶级消费不足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过剩的主要原因。话实先生又很自信地摒弃了消费不足危机说。

按照话实先生的独特而别致的生产过剩危机说，危机只能由生产过剩产生，因而一切看似可以消除生产过剩的变化，包括技术革新、商品输出，乃至战争和自然灾害都可以消除生产过剩。

话实先生认为，战争和自然灾害可以消灭一部分生产能力，生产能力减少了，过剩的生产能力就没有了，这就是消除生产过剩。

话实先生，你能不能向不懂经济学的读者们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生产过剩？是相对于需求的过剩吗还是别的什么过剩？如果是相对于需求过剩，那么有哪一种经济理论告诉你，当你消灭一部分生产能力的时候，需求是可以不受影响、固定不变的？你消灭了一部分生产能力（不是闲置，是消灭），收入或者财富不会减少吗，需求不会下降吗？

确实，历史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处于接近“充分就业”的状态，但那不是因为他们消灭了生产能力，而是因为战争期间政府军事开支大幅度增

加，从而使得原有的生产能力得到充分动员（像美国这样本土没有直接受到战争影响的国家生产能力还大大增长）。

资本主义和全球生态危机

无论如何，按照话实先生的观点，既然经济危机是由生产过剩引起的，那么几乎任何社会和经济变迁都可以消除生产过剩，进而克服经济危机。既然如此，经济危机除了充当资本主义定期的健康检查以外，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资本主义导致生产过剩，生产过剩导致经济危机，于是垄断资本便征服海外市场，经济危机就克服了。垄断资本要征服海外市场，相互之间当然会发生冲突，于是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相互之间要争霸。但是在现代条件下，有核武器，所以争霸也不会导致战争。那么好了，争霸的结果，无非是各个帝国主义国家越来越强大，无产阶级越来越受压迫而毫无办法，资本主义天下永远太平。这便是话实先生混乱的政治经济学逻辑的必然结果。

话实先生不仅认为经济危机不会导致资本主义灭亡，并且认为生态危机更不会导致资本主义灭亡。按照他的生产过剩唯一危机说，生态危机因为会促进环境保护投资，还会帮助克服生产过剩危机。

关于资本主义与全球生态危机的关系，近年来，《每月评论》主编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多有著述。福斯特明确认为，疯狂的、无限制的资本积累已经将全球生态系统推到了崩溃的边缘，其结果，将颠覆人类文明赖以存续的物质基础（当然也包括资本主义赖以存续的物质基础）；人类已经到了“不是社会主义就是野蛮”的历史关头。

话实先生对于《每月评论》是熟悉的。我建议，话实先生将自己关于生态危机无关紧要论的观点发表在《每月评论》上，一定会引起国际马克思主义学界的重视。

话实先生与小资产阶级左派

让我们看看话实先生的长篇巨著最后得出怎样的结论吧：

帝国主义意味着战争。但是我们目前的现实是，美帝国主义手里拥有炸平世界好几遍的核武器，他不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他会做垂死的挣扎。随着美帝国主义的衰退，为了维护美帝国主义的霸权地位，美国人民会付出越来越沉重的代价。这是美国人民觉醒的先决条件。而只有美国人民的觉醒才能避免核武器对人类生存的威胁。但是，只有像朝鲜和越南战争那样全世界人民的反霸斗争，而非帝国之间的争霸才会促进美国人民的觉醒。在核武器时代，人类生存的唯一出路是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共同反对一切霸权！

“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共同反对一切霸权！”一个响亮的口号。在口号的背后呢？

“帝国主义意味着战争。但是……”美帝国主义有核武器，“只有美国人民的觉醒才能避免核武器对人类生存的威胁”。所以，在美国人民“觉醒”之前，一切、一切，都无从谈起。至于美国人民什么时候“觉醒”，这是一个类似于植物人何时苏醒的问题。

这是话实先生长期以来失败主义思想的总暴露。这种失败主义，并不是话实先生个人的，而是相当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左派积极分子所共有的。

近年来，中国的马列主义左派队伍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发展过程中，除了社会主义时代的老革命、老工人长期坚持斗争以外，大量的青年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也在向马列主义左派靠拢。这些新加入左派队伍的青年学生、青年知识分子或者出身小资产阶级，或者在事实上拥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

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发展，大批小资产阶级被排斥在优质劳动力市场以外，出现了边缘化、无产阶级化的趋势。这是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群众政治激进化的客观社会基础。但是，由于这些小资产阶级左派激进分子没有经历过阶级斗争的严峻考验，还没有体会到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他们的思想左倾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个人前途的悲观失望以及对普通劳动群众的廉价同情。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他们不可避免地要夸大资产阶级的力量，认为资本到处都很强大，而劳动解放只能是遥遥无期。

他们不懂得，任何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一定的社会是依赖于一定条件的，而一定社会的发展往往会破坏它自己赖以存在的条件。他们不懂得，矛盾

的次要方面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小的可以变成大的，弱的可以变成强的。在他们看来，现在强大的便只能永远强大下去，现在弱小的便只能永远弱小下去。未来的世界，工人阶级只能是配角，资本和帝国才是主角。

他们不认真学习伟大中国革命的宝贵经验，不重视中国劳动群众自己的斗争传统，而对外国一些屡败屡战的“经验”却津津乐道。他们不努力学习整个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宝库以及世界上最新的进步和革命思想，而是将二十世纪初的一些局部经验奉为不可颠覆的教条，用最革命的口号来掩饰自己最低落的信心。

中国的马列主义左派如果不摆脱这种被小资产阶级左派统治的状况，是必然不能够进步的。中国的马列主义左派也必然能够摆脱这种不尽如人意的状况，在不久的将来使得自己真正成为无产阶级的精神力量和政治代表。

就北大毕业生张云帆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一案致广州番禺警方的公开信

2017-12-22

广州市公安局番禺分局，广州市公安局番禺分局小谷围派出所：

近闻北京大学哲学系 2016 届毕业生张云帆以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被广州市公安局番禺分局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被限制人身自由至今，就此事我们深表关切！

据了解，2017 年 11 月 15 日晚，张云帆正在广东工业大学教室内参与学生自发进行的读书会时，番禺警方以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带走多人，后将张云帆刑事拘留至 12 月 14 日，12 月 15 日又把刑事强制措施变更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 6 个月。目前张云帆已经被从看守所转移出去，被警方关押在秘密居所。

张云帆本科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为人正直，关心社会发展，在校期间积极参与各类公益活动。其毕业后专注公益教育事业，希望通过亲身实践探索中国教育的发展方向。事发前就职于广州某家教育机构，工作勤勤恳恳，同时经常参与公益活动。他的实际行动凸显了一位新时代大学毕业生的正能量。

张云帆是家里的独子。事情发生后，家人万分惊愕。远在内蒙古的父母放下手头的工作第一时间赶赴广州，向办案机关了解案件相关信息，但至今不得所终。年事已高、身体不好的姥姥和爷爷经不起如此沉重的打击，已先后病倒。

截至目前，张云帆已被关押月余。据多种渠道了解，警方对张云帆的指控，同其在这次大学生读书会中，偶然谈及对一些历史事件的个人看法有关。我们认为，对历史事件作评价是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并非他个人标新立异、特立独行、耸人听闻。

众所周知，“依法治国”方略早就被写入《宪法》，党的十九大也将“全面依法治国”确定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我们拥护党中央的这些战略方针，也愿意身体力行地践行这些理念。因此，我们希望番禺警方能够在依法治国、合理使用公权力的框架内妥善处理此事。

我们希望警方能够体谅一个年轻人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以及表达自己对一些事件的观点时，其出发点还是为了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张云帆参与了一次学生读书会的讨论，表达了一些自己的观点，即便其个别观点不甚妥当，但在其没有造成具体社会影响的前提下，我们还是希望警方能给予年轻人一定的宽容和学习进步的机会。

张云帆从小身体不好，患有高血压，希望广州警方能在尽快的时间内，对他的事情做出结论。我们希望警方可以让他尽快返回工作岗位！这样也可以减少广州警方不必要的警力浪费，减轻警方的额外工作负担，以便能将更多精力投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建设事业中去。

根据最新消息，警方在将张云帆刑事拘留 30 天后，并未向检察机关申请对张云帆逮捕，而是直接将强制措施变更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六个月。我们认为，警方这一做法严重侵犯了张云帆的合法权利。按照相关法律规定，警方在长达 30 天的期限内尚不能收集足够证据证明张云帆涉嫌犯罪，就应当将张云帆予以释放或取保候审，而警方对张云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六个月。我们认为此举番禺警方涉嫌滥用司法程序和资源，变相剥夺张云帆的人身自由。

有鉴于此，我们诚恳希望广州番禺警方：

- 1、依法办案，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重新审视已做出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这一刑事强制措施决定，并尽可能让他早日返回工作岗位，为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
- 2、切实保障张云帆在被监视居住期间的一切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

3、在张云帆身体健康方面给予关照。

社会各界关注张云帆的人士

2017年12月21日

附：联署名单：

(更新于2017年12月25日11时00分持续更新中...)

钱理群	北京大学
孔庆东	北京大学
陈波	北京大学哲学系 教授
李零	北京大学中文系 教授
柴晓明	北京大学
张伦	北大校友 巴黎大学教授
宋磊	北京大学 教师
汤敏	北京大学 校友 公益人
林垚	北京大学 校友 学者
李豪	北京大学 校友 剑桥大学在读博士
罗勉	北京大学 校友 斯坦福大学博士
朱文琳	北京大学 校友
魏域波	北京大学 校友 编剧
薛扶民	北京大学 校友
周红豆	北京大学 校友
罗美云	北京大学 哲学系 校友
丁小平	北京大学 校友
胡乔杰	北京大学 校友
黄慧	北京大学 校友
柏升	北京大学 学生
刘心怡	北京大学 学生
刘博涵	北京大学 学生

熊岳汉 北京大学 学生
关昱程 北京大学 学生
常洋铭 北京大学 硕士研究生
仝晓霞 北京大学 学生
邢逸旻 北京大学
汪弘毅 北京大学 学生
孙宇 北京大学 学生
江唯 北京大学 学生
张旭 北京大学 学生
刁天放 北京大学 学生
张安琪 北京大学 学生
刘凯健 北京大学 学生
李欣然 北京大学 学生
刘俊杰 北京大学 本科学生
廖章伊 北京大学 学生
张兴泽 北京大学 专升本
马壮 北京大学 学生
宗志杰 北京大学 学生
秦晖 清华大学
旷新年 清华大学
程曜 清华大学 工程物理系教授
李章瑞 清华大学
王珂 清华大学
柯豪 清华大学
何雪梅 清华大学 学生
曹丰泽 清华大学 博士

黄纪苏 北京学者
赵志勇 北京学者
祝东力 北京学者

于建嵘 社科院
徐友渔 社科院
靳大成 社科院
宋俊岭 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王朝晖 中科院

赵典军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 北京市海淀区第八、九、十一、十二、十三届人民代表
 荣健欣 中山大学 副研究员
 杨聪雷 重庆大学 教师

陈洪涛 媒体人
 范景刚 媒体人
 刘武洲 媒体人
 秋石客 媒体人
 王雄基 媒体人
 高贵真 媒体人
 包海林 媒体人
 王廉洁 媒体人
 刘虎 媒体人
 胡星星 媒体从业人员
 王挣 艺术家
 杨开 艺术家
 钱荣荣 自由艺术家
 娜彧 作家
 魏欣 医生、魏巍先生的女儿

李民骐 美国犹他大学经济学教授 北京大学校友
 陈美霞 台湾成功大学 退休教授
 张跃然 哈佛大学
 郭博雅 哈佛大学
 安太然 哈佛大学
 钱聿杰 耶鲁大学
 殷思远 美国麻省大学

Adam Xu 里德学院 学生
 钟思骋 里德学院 学生
 秦清 曼彻斯特大学
 董惠颖 爱丁堡大学
 董益丰 英属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 学生
 陈伟祥 宾州州立大学
 赵蒙昞 宾夕法尼亚大学
 李唐辙 利兹大学
 李云童 莱斯大学 学生

王一伏 科罗拉多大学 哲学系学生
 HP T. 加州大学河滨校区 学生
 Astrid Lu 香港城市大學
 Nora Niu 香港大学 学生
 王巨 香港大学 学生
 郑嘉馨 东京大学
 潘逸飞 东京大学 学生
 赤坂羽 京都大学
 张亦澄 北海道大学 学生
 要欣 纽约留学 学生
 温正 NEU Master
 焦竹晗 CMU Master
 Zhuocheng Xiao PhD student, University of Arizona.
 宋迈克 旅法工程师

韩昱 中国人民大学 校友
 江雪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本科学生
 潘晓雨 北京师范大学
 金衍 北京师范大学 学生
 张丽轩 北京师范大学 学生
 张广植 北京师范大学 学生
 吴昊 北京师范大学校友 自由职业
 戴雯 北京语言大学 学生
 裴梵鑄 北京语言大学 学生
 邓阳雅笛 北京语言大学 校友
 张润泽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延庆分校
 阿斯楞 北京印刷学院
 王笑 北京交通大学 博士
 涂苏 北京理工大学 学生
 常悦 北京工业大学 学生
 林梦妍 中央财经大学 学生
 谢鹏宇 中央财经大学 学生
 张泽鲲 中央民族大学 学生
 殷东贵 中央民族大学 学生
 肖严 北京科技大学 本科学生
 顾欣玮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学生

周乐怡 北航 学生
龚建伟 天津理工大学 学生
徐小 首都师范大学 博士
许若希 浙江大学 学生
沐仲达 杭州大学文学部 学生
艾琳 杭州大学文学部 学生
刘苏以宪 杭州大学理学部 学生
叶子 钱塘江大学工学部 学生
商绍之 钱塘江大学经济学院 实习生
张茜 重庆大学 学生
梅浩宇 重庆师范大学 学生
黄焕庭 华南师范大学 学生
梁泽熙 华南师范大学 学生
徐浩峰 汉理工大学 学生
王民超 复旦大学 学生
张采薇 复旦大学 学生
李卓然 复旦大学 学生
杨采妮 同济大学
金江南 同济大学浙江学院 学生
丁梦茹 上海海事大学 学生
顾文汐 上海交通大学 学生
明山雨 上海科技大学
徐新愉 上海政法学院 在读学生
董峰 上海师范大学 在读研究生
池伟添 华东师范大学 学生
曹一飞 东北电力大学
夏博阳 辽宁大学
朱仁礼 兰州外语职业学院
邱子晋 枣庄学院
吕娜 嘉兴学院
洛霄河 苏州大学
刘沁清 苏州大学
吉文鑫 东北师范大学
李永杰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社工学生
王鑫磊 苏州高博软件学院

李慰庭 黑龙江外国语学院
武天栩 安徽医科大学
刘翼衡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
陈名扬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张海兵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少正翎 衢州化工学院
杨宇澄 山东艺术学院
丘振翊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张帆 桂林理工大学
姚玥 四川大学
张珺宁 四川大学
吴婧闻 中南大学
李承泽 江南大学
李玉梅 浙江师范大学
金万恩 云南财经大学 独立诗人学生
赵秋婷 大连工业大学 学生
沈晁 成都实外西区 学生
代雨肖 黑龙江大学 学生
赵梵慧 黑龙江大学 学生
许可轩 东南大学 学生
刘懋木 集美大学 学生
孙信 江苏师范大学 学生
李静 南京财经大学
朱清甄 南京大学 学生
马灿林 南京大学 学生
李想 南京师范大学 博士后
唐恢彧 长江大学 学生
李磊 长江大学
望明归 西交利物浦大学 学生
夏天 西交利物浦大学 学生
大国兔 西交利物浦大学 学生
张之恒 西交利物浦大学
柯钦 西安理工大学 本科生
张祖武 兰州大学哲学系 学生
刘海燕 曲阜师范大学 学生

李晓萱 江南大学 学生
邢航 江南大学 学生
张句 辽宁师范大学 学生
谭睿智 深圳大学师范学院附属中学 学生
胡泰然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 学生
王俊泽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 学生
黄礼 重庆师范大学 学生
裴文哲 宁波诺丁汉大学 学生
俞亦凡 湖北大学 学生
雷宗杰 深圳大学
韩静 盐城师范学院 学生
周焱 河南大学 学生
易士武 太原理工大学
汪少涵 广西师范大学 学生
林澳庆 缙云中学 学生
洛河悟 太原外国语凤凰双语中学校 学生
高铭怡 育才学校 学生
张句 辽宁师范大学 学生
张牧戈 独立学生
解诚承 巴蜀中学 学生
王镜龙 龙口第一中学
欧阳承平 三十一中 学生
陈德安 温州中学学生
吴张豪 上海市崇明中学 学生
钟振宇 南宁三中 学生
丁锋 中学生
赵冉 法学生
卫叔昂 学生
徐志豪 学生
方然 学生
杨玉庆 学生
何欣 学生
冯嘉馨 学生
刘庭玮 学生
陈奕希 学生

王子凡	学生
杨雪	学生
黎乐诗	学生
赵萌宇	学生
王琮	学生
冯孟	学生
薛博光	学生
颜家仪	学生
毕睿	学生
高语晨	学生
张金梦	学生
陆怡雯	学生
宋德永	学生
廖宇萌	学生
苏鑫	学生
贺芾棠	学生
白艳波	学生
魏秉倩	学生
赵永健	成都灯光夜读读书会 创始人
黄超	中裔控股集团 创始人
曲晨	凯风公益基金会项目经理
米宁	莱茵杂志社社长 黑龙江大学
张舒迟	NGO 工作者
姚雨彤	NGO 从业者
李翹楚	NGO 工作者
郭月瞳	NGO 工作者
杨占青	公益人士
郑楚然	女权主义者
梁小门	女权主义者 Fordham University Law School
李金宏	社会学者
金旺	医生
陈时秋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离休干部
刘志标	中小学教师
沈宇宸	中小学教师

陈默	中学教师
许罗琪	小学老师
兰春荣	大连科研所翻译
墨秋	教师
万宝玮	教师
红霞	学者
王仁俊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退休职工
陈静岩	国家工作人员
刘燕群	和平使者 高级教师
吴定洲	反腐调研员
白明	北京科技工作者
张荫乾	七一八厂退休干部
王娟	山东济南市千佛山医院 (三级甲)
张友德	湖南为民服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闫惠人	职员
许第根	海军机关职工
温永瑞	共产党人讲习所保卫科长
黄进源	深圳企业职员
王元	企业职工
王小泉	企业职工
孙圣佼	企业职工
李政南	富士康工人
王莹	工人
孟晗	广州工人
梁育民	农民
夏奔	农民
李双菊	农民
黄枷鑫	农民工
王啻	农民工
陆中明	陕西自由撰稿人
李家哲	自由职业者
张伢子	自由职业者
康明	自由职业者
李文采	自由职业者
戴远	自由职业者

罗绍栋 自由职业者
王飞 自由职业者
姚春曲 自由职业者
王亮 自由职业者 产品设计师
周宇 自由职业
伊藤由夏 自由职业
周鹏 自由职业 互联网运营从业者
何逸 互联网从业者
李贵敏 互联网从业者
左泉 杭州市某书店 店员
魏再焕 海燕社 共青团员
李蔚 北京公民
罗其云 退休电脑工程师
张志军 石家庄退休人士
程跃洲 退休工人
青春永驻 退休职工
正常 退休职工
赵宇新 下岗职工
裘庆福 上海江南造船厂退休工人
孟宪达 徐州市民
张国领 北京华德恒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评估助理
朱志强 河北中科恒云股份科技有限公司 前端工程师
梁波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 市场经营部职员
陶志远 长沙齐翔集团 软件工程师
高磊 内蒙古呼和浩特邮政公司 职员
刘斌 四川同舟税务师事务所
郑雯琳 会计 亿滋
武夏 北京品推宝 运营人员
倪世忠 贵州安顺 公民
赵师祺 公民
巫丽 公民
张思远 公民
王启龙 公民
伍恩庭 公民
农庆国 创业

刘文凯
魏海胜
王洛鑫
周卉卉